

學 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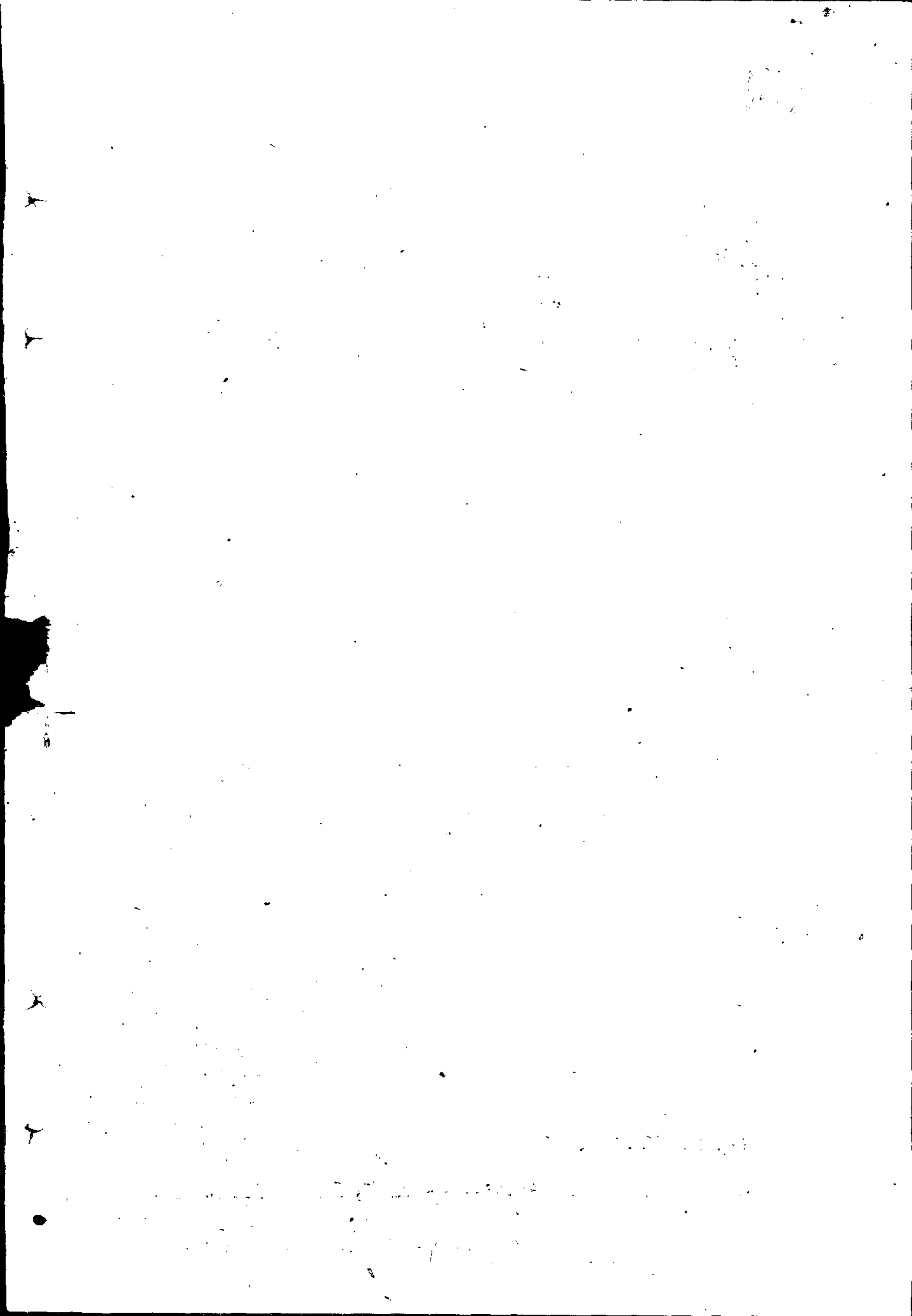
第 13 期

1948. 12.

本 期 目 錄

中共中央負責人評中國軍事形勢.....	1
人民解放軍總部發佈懲處戰犯命令.....	3
東北局對公開建黨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規定.....	5
在結束土地改革的地方，糾左必須防右（新華社社論）.....	10
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東北日報社論）.....	15
新的任務與新的力量（列寧）.....	21
反對局部觀點樹立全局觀點（東北日報專論）.....	27
經驗與經驗主義（東北日報專論）.....	37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陳伯達）.....	45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劉少奇）.....	62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政治部出版



中共中央負責人評中國軍事形勢

新華社陝北十一月（一九四八年）十四日電：中共中央負責人評中國軍事形勢稱：

現已進入一新的轉折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佔有優勢，而且在數量上現在也已經佔有優勢。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已經迫近的標誌。

國民黨軍在戰爭的第二年底，即今年六月底，總數約計尚有三百六十五萬人。這個數目，對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國民黨開始發動全國性內戰時期的四百三十萬人來說，是少了六十五萬人。這是由於國民黨在兩年戰爭中雖然被殲被俘和逃亡了大約三百零九萬人（其中被殲被俘為二百六十四萬人），但因國民黨在此期內補充了約二百四十四萬人，故虧短數尚只有六十五萬人。最近則起了一個突變。經過戰爭第三年度的頭四個月，即今年七月一日至十一月二日瀋陽解放時，它即喪失了一百萬人。四個月內國民黨補充情形尚未查明，假定它能補充三十萬人，虧短數為七十萬人。這樣國民黨全軍包括它的陸海空軍正規軍非正規軍作戰部隊和後勤機關都在內，它現在只有二百九十萬左右的人數。

人民解放軍，則由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萬人，增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一百八十萬人，現在則又增至三百餘萬人。這種情況，就使國民黨軍在數量上長期佔有的優勢，急速地轉入了劣勢。這是

由於四個月內全國各戰場人民解放軍英勇作戰的結果，而特別是南線的龍杞戰役、濟南戰役，北綫的錦州、長春、遼西、瀋陽諸戰役的結果。國民黨的正規軍，因為它拼命地將非正規軍編入正規軍內，至今年六月底尚有五百八十五個師的番號。四個月內，即被人民解放軍殲滅了營以上部隊合計共八十三個師，其中包括六十三個整師。這樣，就使我們原來計算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原來預計，從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至於在全國一切地方消滅反動勢力，完成人民解放，則尚需較多的時間。敵人是正在迅速崩潰中，但尚需共產黨人、人民解放軍和全國各界人民團結一致，加緊努力，才能最後地完全地消滅反動勢力，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統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國。

人民解放軍總部發佈懲處戰犯命令

我人民解放軍自轉入進攻以來，所向無敵，全國勝利，屈指可期，國民黨反動派悍於覆沒的命運，近更絕滅人性，施放毒氣，屠殺人民，破壞建築，燬滅物資，作垂死的獸性的破壞。我全軍上下，除應更加努力，採取一切有效辦法，保護國家與人民之生命財產，使之免遭國民黨軍隊潰敗被燬時之破壞與損失外，應對此種戰爭罪犯澈底追究，嚴予懲處。爲此，特根據我軍一九四七年雙十節宣言之精神，宣佈如下命令：

一、凡國民黨軍官及其黨部政府各級官吏，命令其部屬，實行下列各項罪惡行爲之一，而證據確鑿者，均應加以逮捕，并以戰犯論罪。

- (一) 屠殺人民，搶掠人民財物或拆毀焚燒人民房屋者；
- (二) 施放毒氣者；
- (三) 殺害俘虜者；
- (四) 破壞武器彈藥者；
- (五) 破壞通訊器材，燒燬一切文電案卷者；
- (六) 燬壞糧食，被服倉庫及其他軍用器材者；

(七) 燬壞市政水電設備、工廠建築及各種機器者；

(八) 燬壞海陸空交通工具及其設備者；

(九) 燬壞銀行金庫者；

(十) 燬壞文化古蹟者；

(十一) 燬壞一切公共資材及建築物者；

(十二) 空襲轟炸已解放之人民城市者。

二、凡帶頭執行以上各項罪惡行為之一者，亦應依法懲辦。

三、凡採取有效辦法，因而使人民的生命財產，及一切屬於本軍的戰利品及城市建設獲得安全或免於破壞者，均給予應得之獎勵。

我各地人民解放軍應切實執行此項命令。

我軍對待國民黨反動派黨政軍人員的政策是：「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上述戰爭罪犯屬於首惡者一類，必須追尋他們至天涯海角，務使歸案法辦，不容漏網，切切此令。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 朱 德

副總司令 彭德懷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東北局對公開建黨中

幾個具體問題的規定

最近各省對建黨工作，都開始重視，這是很好的。但在建黨中，還有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各地均不統一；爲了建設一個堅強的羣衆性的黨，關於這些具體問題的處理，特根據黨章統一規定如下：

一、發展對象——東北地方黨，目前還在打基礎的階段，在發展黨員時尤其要注意成份。一方面必須明白確定發展的對象應該主要是工人與常年勞動的貧僱農中的先進分子及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同時，必須嚴防投機分子地主富農分子與流氓分子混入黨內。因此，在具體發展黨員時，應根據以下各項：（一）在農村中，首先應吸收在土地改革與生產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僱貧農成份及工人的積極分子入黨。對於中農可吸收經過鬥爭考驗的覺悟進步的分子入黨，過去被鬥錯的中農，一般的暫時不要吸收。（二）城市中應首先着重吸收公私企業中的產業工人（包括技術工人）、手工業工人、苦力及下級職員入黨。在中等以上的各種學校中，應吸收革命的青年學生及革命的教職員，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的積極分子入黨。城市貧民中的積極分子，亦應酌量吸收；但由於在城市貧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逃亡出來的地主富農分子和反動的敵方人員，並且他們在城市鬥爭中，有的還成爲積極分子，

因此在吸收新黨員時，應加以警惕。(三)目前在一般知識分子中，包括知識分子職員、自由職業者，有合乎入黨條件，且在工作中已經過若干時期的考驗已具有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思想者，應及時吸收入黨，不應故意拒絕(其中的青年，入黨條件尚不夠，但確是進步分子，則可介紹入青年團)

(四)對股長以上敵方職員及自願參加其他黨派或政治團體者，現雖已脫離黨派關係，暫時亦不應吸收入黨。凡會被國民黨強迫入黨，或集體入黨，並未為該黨作過任何政治活動，在短期間內已脫離該黨關係，且有人證明者；對這些人在入黨問題上應當與自願加入反動政治派別者，在處理上有所區別；基本上可按其社會成份處理；但也應與從未加入反動政治團體，特別是一貫反對國民黨者，加以區別，詳加考察，並按照情況酌量延長其候補期；其批准入黨機關，亦應提高一級。對參加過社會封建迷信團體(如家理教、青洪幫等)或宗教信仰者，即使其現在已具備其他入黨條件，亦須在其實際退出該團體，放棄該信仰後，方可吸收入黨。(五)部隊中發展黨，應首先吸收工人與貧僱農成份的積極分子入黨。凡經過考驗的中農成份的積極分子，亦應吸收入黨。凡勞動人民入伍已滿一年者，入黨時應一律按照工人入黨時的手續辦理。凡參加我軍至二年以上的地主或富農子弟，其中作戰勇敢，學習積極，思想純正，歷史清白，屢經戰鬥與擁愛運動考驗，具有革命決心的積極分子，亦可吸收入黨。(六)在上述各種對象中，應注意吸收有覺悟的青壯年婦女入黨。

二、黨員條件——在以上對象中，應首先選擇成份好、歷史清白、工作積極、為人正派、為羣衆所擁護且有相當政治覺悟的先進分子入黨。在其入黨前，必須自願承認黨綱、黨章，參加黨的一個組

織，爲黨工作，服從決議，遵守紀律，繳納黨費者。這是一個黨員的起碼的政治標準，否則不應吸收入黨。因此，新黨員入黨前，必須公開直接地向其簡明講清黨綱黨章的意義，進行入黨的教育，在其提出要求入黨後，方可吸收入黨。

三、介紹人——公開建黨中，新黨員入黨，在黨委批准前，必須有介紹人。介紹人對被介紹人在政治、歷史、成份、品質、思想上，應負切實責任。這是黨委批准新黨員入黨的重要根據之一。因此，介紹人對被介紹者，在未呈請黨委批准前，必須做周密的了解與必要的教育，待其各方面條件成熟時方可呈請批准。在黨的基礎較好的地方，吸收任何成份對象入黨，其中介紹人之人數與資格均須嚴遵黨章規定執行。在黨的基礎很薄弱，或沒有基礎的地區，吸收工人、苦力、僱貧農、城市貧民、革命士兵入黨，可由正式黨員一人介紹。但對其他成份吸收入黨，則須按黨章規定辦事。

四、入黨手續——凡新黨員入黨，均必須個別履行入黨手續。在有支部的地方，請求入黨者，得經羣衆公議，提出意見，介紹人與之談話了解填表後，須由支部大會討論通過，然後呈請區委批准。在沒有支部的地方，得經自報公議及介紹人對被介紹人確實了解並填表後，即可直接呈請區委批准。但黨批准任何一個新黨員入黨時，應在政治上組織上負責。因此必須根據介紹人的報告，羣衆公議的意見，及黨委各方面的了解，經過黨委會詳細討論研究分析，而後作出負責的決定，切不可由書記或其他委員一人潦草批准。黨委的任何個人，沒有這種權利。各種成份黨員入黨，應由何級黨委批准，應按黨章規定執行。

五、入黨儀式——新黨員經過批准入黨後，即應舉行慎重嚴肅的入黨儀式（可邀請羣衆參加），並有上級黨委派人監督。在舉行儀式時，除宣讀誓詞外，並應進行如何作一個好黨員的教育。這對新黨員與羣衆來說，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六、候補期——在黨的基礎較好的地方，吸收新黨員入黨，其候補期之長短，均須按黨章規定執行。在沒有黨的組織或黨組織很微小的地區，工人、苦力、僱貧農、革命士兵入黨，暫規定三個月候補期（待黨的組織已經有了基礎後，即應按黨章辦事）；其他成份入黨，則須按黨章規定執行。候補期的作用，爲保證對候補黨員進一步的考察其政治品質，加強其政治階級教育，使他更牢固地確立革命思想與組織觀點。羣衆觀點，因此黨委對每一個候補黨員，必須認真地負起審查與教育的職責，不然則會失掉候補期的意義。候補人期滿後，應由其所所在的支部大會（在有支部的地方），或由其原批准機關，按其進步程度，決定其轉黨或延長候補期。如因其本人落後，經兩次以上延長候補期，且確實屢經教育仍不進步者，應取消其候補資格，並可向羣衆宣佈。候補黨員轉黨時，一般應經過支部大會通過，區委批准。候補黨員個人進步很快，屆期已够轉黨條件，因黨委疏忽而未及時轉黨者，可補行轉黨式，其黨齡應按其原定候補期滿時算起。

建黨工作，是一個鄭重嚴肅的任務，對整個黨的建設，起着基本的重大的作用。各省縣黨委，特別是其組織部，必須親自認真地掌握這一工作，切不可只規定任務，發出指示，交給區委和支部去完成，就算完事。這是因爲區支幹部，對建黨工作缺乏經驗，如不加強領導與掌握，是不可能把建黨工

作作好的。因此，希望各省縣領導機關把建黨工作放在重要地位，親自掌握，派遣純正可靠的好幹部去執行與完成這一任務，以保證我東北黨完全遵循正確道路建設起來，並希經常總結經驗報告我們。

中共中央東北局

一九四八年十月廿六日

在結束土地改革

的地方，糾左必須防右

——新華社十一月（一九四八年）十日社論

最近一個時期，在老解放區的大部鄉村，在過去兩年土地改革偉大成就的基礎上，正進行着結束土地改革的工作。很多地方正確地解決了土地改革中所遺留的問題，穩定和提高了農村各階層人民的生產情緒，獲得了成績。雖然有些地方，對於過去土地改革運動中一度流行的某些左的偏向和錯誤，糾正得還不够徹底，以致在結束土地改革工作中仍有一些左傾的殘餘存在，這種現象必須繼續加以糾正。但是在老區半老區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和錯誤，一般地早已經被停止了，而目前在結束土地改革工作和解決在過去犯左傾錯誤時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中，即在進行停止左偏以後的善後工作中，有些地方，又開始生長着一種右的偏向或錯誤，例如太岳區的翼城縣北丁村、冀魯豫區的聊陽縣王化村和北嶽區的易縣魚坨村等地的形勢。雖然這種右傾並未發展成爲當前普遍的主要的危險，但在個別鄉村則成爲當前主要的偏向，如不加以迅速糾正，則仍有成爲普遍的主要危險傾向之可能。任何右的偏向

或錯誤，和左的偏向或錯誤同樣，是不能容許的，如果任其發展，就會成爲一股逆流，嚴重地損害土地改革所已得到的偉大成果。

爲了鞏固與發展土地改革的成果，正確地結束土地改革工作，各地在繼續反對左的思想和錯誤的同時，必須十分警覺地防止右的偏向和錯誤的生長，必須認識目前這種右傾的特點，是向右的方面離開了黨中央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依靠貧雇農（包括新中農）、團結中農、沒收封建與半封建的土地財產，首先滿足貧雇農要求的基本政策，在糾正左傾中只片面地注意補償中農和安置地富，而不顧貧雇農的困難和意見。靈城縣北丁村的工作人員，迫使在全村一百九十三戶中佔七十戶的貧雇農和三十二戶的中農，將分得的土地財產，「不管有無問題，一律全部退還」給十四家被鬥戶（其中有十一戶被鬥以後，仍保持着中農生活），以致十七家翻身農民降爲赤貧或貧農，一家地主却佔有一倍於平均數的土地，九家富農所得土地質量超過貧農半倍，而村中積存的鬥爭果實，却既未分給貧農，又未用以補償中農。這就是這種右傾的極端例證之一。此外，有的地方，土地問題並未普遍徹底解決，却已不準備繼續認真地解決土地問題；有的地方輕率地把地主又錯算成富農，或把舊式富農又錯算成新富農或中農，並退還其封建財物；有的地方不願在照顧中農利益的同時，設法滿足貧雇農要求；有的地方不問具體情況如何，籠統地規定對於「被鬥鬥戶」必須「全部退還原物」，強迫一切貧雇農成份的新幹部必須「承認錯誤」。與這些政治上的錯誤相伴而來的，則有兩種形式的組織上的錯誤：一種是在結束土地改革工作中放棄領導；一種是超過現有的組織，不依靠黨內和羣衆中的積極分子和較好分子，脫離

羣衆，包辦代替，用命令主義的方法來實行所謂「自覺的由上而下的強迫無條件糾偏」。在實行這種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極端錯誤政策的地方，基本羣衆垂頭喪氣，有的貧農甚至被迫逃跑，而地主、舊富農和某些被清洗、被撤職的壞幹部、壞黨員，却興高采烈。

這種右的錯誤是從何而來的呢？犯這種右的錯誤的，大體上有兩種不同的人：一種人是自覺的，他們是混進革命隊伍中的地主富農分子，或是具有濃厚地主富農思想的人們，他們實際上反對土地改革，不承認土地改革的必要和土地改革的巨大成績。處處阻撓土地改革之澈底實行。或者是一些犯過嚴重自私自利強迫命令脫離羣衆錯誤的分子和一些宗派主義分子，他們在土改整黨過程中，受過處罰，也許這些處罰有些過分，使他們在土改中受過委屈心懷不滿，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就無原則地同情被羣衆所鬥爭的對象而在實際上成爲地主、富農和真正不可救藥的壞分子的俘虜，在結束土地改革的過程中，對黨的政策貫徹，也起了阻撓的作用。另一種人是不自覺的，他們或者是思想上有極大的片面性，過去曾經犯了嚴重的左的錯誤，造成了許多惡果，糾正左傾錯誤之後現在又偏到右的方面去了，或者是不會按情況辦事，而在實際工作中又確實遇到困難，如在所謂「窟窿大，補釘小」的情形下，他們只知道必須完成補償與安置的任務，就不問青紅皂白，強迫羣衆退出果實。這些人的大部份，還是我們黨內的好同志，但是由於他們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太低，思想上帶有極大的片面性，作風上的命令主義殘餘未肅清，因而在執行政策中搖擺不定發生了偏差。

因此，各級黨委在結束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抓緊領導，既應糾左，又應防右。一方面必須繼續

認真解決由於過去土地改革工作中左的偏向所造成的許多遺留問題，特別是關於改定成份，補償中農及整黨中處分錯了的一些幹部問題的處理，並克服在結束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左傾殘餘。但在另一方面，又必須反對和防止右的偏向。在具體工作上說，就是應該依靠鄉村中黨的支部、貧農團和農會中的積極分子與較好分子的自覺，根據既滿足貧僱農要求，又照顧中農利益的原則，團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羣衆，認真走羣衆路線，真正錯定成份者，必須改定，同時要按照黨的政策及具體情況與可能的條件，來進行補償中農和安置地富等工作，即是有領導、有羣衆、有條件、有步驟地恰當地進行糾偏和結束土改的工作。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按情況辦事，如果當地還有未分配的土地及其他果實或公共財產或查出的黑地，或是可以退出而又不影響分得果實者生產的和生活的必要資料，就應該用這些東西來適當地補償中農或安置地富。如果本村確無上述各項土地財物，十分困難，那就應該採取分年減徵被錯鬥中農的公糧，或多借一部份農貸給錯鬥的中農，或由政府撥給糧款來解決補償和安置的問題，絕對不應該不問情況如何，強迫翻身農民吐出他們所應該分得和已經分得的果實，退還被鬥戶。總之，我們首先必須在鞏固過去土地改革偉大成就的基礎上，來糾正偏向，結束土改，而在解決土改所遺留的問題和糾正左的偏向時，我們必須要照顧土地改革中滿足貧僱農要求的歷史任務，仍然要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來組織強大的羣衆隊伍。對於發生了右的偏向的地方，應該予以及時的克服，並且按照錯誤的性質，分別對於犯錯誤者進行思想上的教育和組織的處置，以達貫徹關於土改和整黨的正確政策之目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迅速而健康地結束或完成土地改革工作，並鞏固土改、整黨的成

續，以便在解放生產力之後，確實有效地以勞動人民為主體，團結各階層人民，共同努力恢復與發展生產，更加有力地支援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新華社陝北十一月十日電）

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

——東北日報十一月（一九四八年）九日社論——

全東北的完全解放，在東北黨前面提出了許多巨大的新的任務，尤其是經濟建設的任務，這使我們工作的範圍愈來愈廣大了，使我們工作的性質愈來愈複雜了，因而我們需要的幹部也就愈來愈多了。於是到處感覺到了「缺乏幹部」，「沒有幹部」的困難。幹部的需要與幹部的供給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如何正確的解決這一矛盾，已經成爲我們工作前進道路上的一个嚴重問題了。

從關裏補充老幹部的希望，早已沒有了。由於全國革命的巨大勝利，由於全國革命局面的很大開展，我們不但不能希望從關裏派來老幹部，相反的，我們還有準備從東北抽調出大批幹部到關裏去，幫助新收復區建立新解放區的任務。在老幹部方面，我們目前只能做到，加強對他們的教育，提高他們的質量，進一步發揮他們的力量，並在各個部門中間加以適當的調整，把他們的力量使用在最主要的方面。但這並不能解決幹部缺乏的困難，是很顯然的。老幹部的數量是如此有限，企圖在老幹部的圈子裏，解決幹部缺乏的問題，是沒有希望的。

只有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才是解決幹部困難問題的主要方法。今天沒有成千成萬的新幹部來

担負各方面的負責工作，我們就不可能完成新形勢在我們前面所提出的新任務。當然，在提拔與培養新幹部方面，我們過去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也有很多成績；但是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還是做得很不够，尤其在今天迅速開展着的新形勢前面，更加顯得不够了。而黨內某些老幹部中存在着的對於新幹部的某些不正確的認識與不正確的態度，却常常束縛着他們的三腳，使他們在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的道路上，不敢邁步前進。因此，爲了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以適應於今天新形勢與新任務的需要，對於那些不正確的思想與態度，實有加以指出的必要。

有些担負領導工作的老幹部，當他們提出幹部缺乏時，在他們的心目中往往只看到爲數很少的老幹部，而不看到大量存在的新幹部。他們不了解，三年來東北形勢的順利發展的過程，和我們工作的擴入與深入的過程，就是東北新幹部從羣衆中大量湧現出來的過程。政治形勢愈是對我們有利，羣衆運動愈是擴大與深入，在工人、農民與知識份子中願意爲革命服務的人，從羣衆中湧現出來有才能的人與有天才的人也就愈來愈多。新任務的提出，同時也提供了解決新任務的幹部條件。正像馬克思所說：「任務本身只有當它能藉以得到解決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着或至少正在形成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出來。」這在幹部問題上，顯然也是如此。

無疑的，老幹部會是建立東北根據地工作中的領導者與骨幹，而且今後還是如此，但老幹部如果沒有成千成萬新幹部的幫助與支持，東北根據地的建立，是不可設想的。事實上，在前方與後方，在農村與城市，在各個戰綫與各個方面，在少數老幹部領導下到處活躍着，戰鬥着，工作着的大多數幹

部，不正就是新幹部嗎？在東北根據地的建設中，新幹部同老幹部一樣，是有很大的功勞的。新幹部與老幹部，正像「車之兩輪」，缺一不可的。如果我們看不見這成千成萬的大量新幹部的存在，對他們的作用估計不足，就會使我們在幹部問題上，片面強調老幹部而忽視新幹部，就會使我們在解決幹部困難問題上，老在老幹部中打圈子，而找不到正確的出路。反之，如果我們除了少數老幹部之外，還看到這大量新幹部的存在，那我們就會知道如何從提拔與培養新幹部中去解決幹部的困難問題了。現在不是沒有幹部，現在有的是幹部，只是要我們去大量提拔與培養而已。對幹部困難問題，表示束手無策與悲觀失望的情緒，是不正確的，是不合於當前的實際情況的。

還有些担負領導工作的老幹部，當他們提出幹部缺乏時，往往只看到老幹部的優點，而沒有看到新幹部的優點，因而往往偏於信任老幹部，而不够信任新幹部。當然，信任老幹部是應該的，看到老幹部的優點，也是對的。正像斯大林所說的，「老幹部擁有年輕幹部所沒有的東西，即領導方面的豐富經驗，馬列主義的原則鍛鍊，深諳事理的知識，決定方針的能力。」這自然是老幹部的優點，雖然這種優點，在不同程度的老幹部中也不是一樣的。至於新幹部，正因為他們是新幹部，所以暫時還不可能具備老幹部的那種優點，要具備那些優點，還須在今後工作中繼續加以培養與鍛鍊，但是新幹部也有新幹部的優點。這正如斯大林所說的，「他們具有很充足的對於新事物的知覺，而這是每一個波爾什維克工作者寶貴的品質。」同時還應該看到，東北新幹部較之關裏來的老幹部更為熟悉當地的情形，他們與當地羣衆更有密切的聯系。他們在工作中有高度的熱情與積極性，他們有刻苦耐勞的精神。新

幹部的這些優點，是我們應該充分看到的。因此，只要我們老幹部能很好的領導他們，大膽的去提拔與培養他們，信任他們，給他們以更多負責的工作，他們就會很快的學會革命的新知識與革命的新經驗，他們就會很快的向前進步。而且會很快的趕上老幹部，成爲老幹部的有力助手與接替者的。甚至在有些地方，有些工作部門，他們還會比某些老幹部進步得更快，不僅會趕上，而且還會超過。因爲不幸的是，在老幹部中，有些人還背着包袱，擺老資格，自以爲是；固步自封，缺乏對於實際生活中新事物的知覺，因而不能進步，不能發展，結果不能不在前進道路上掉隊落伍。所以斯大林曾經嚴重的警告過老幹部，「喪失對於新事物的知覺」，是老幹部的「一個嚴重而危險的缺點」。所以我們目前也必須着重加強對老幹部的理論的、政策的與策略的教育，把老幹部提高一步，使老幹部不愧爲新幹部的領導者。

毫無疑義的，我們應該歡迎與幫助新幹部的迅速上進，歡迎他們趕上老幹部，甚至超過某些不願進步的老幹部。對於妨礙工作進步的某些頑固不化，傲慢自大的落後的老幹部，應該毫不遲疑的調換他們的工作，讓優秀的朝氣勃勃的新幹部去接替他們。這對於革命的工作，只有好處。任何壓制新幹部上進，害怕新幹部上進的思想與行爲，都是應該反對的。因爲這不但不是爲了解決幹部問題，而是在解決幹部問題之前預先堵塞了解決幹部問題的大門。

有些担任領導工作的老幹部，他們不敢提拔新幹部的主要理由，說是新幹部提拔早了，怕他們在工作中犯錯誤，使工作受到損害。這種顧慮，是似是而非的。因爲事實上，現在已經不是對新幹部提

過早的問題，而是要及時提拔的問題了。三年來，在東北戰爭與土改的巨大革命浪潮中所湧現出來的大批新幹部，他們已經經過了相當的鍛鍊與培養，在這一基礎上，大量的進一步的提拔其中的優秀份子，現在已經是時候了。現在已經不是等到那年那月把新幹部鍛鍊好了，培養好了，再來提拔的問題，而是立即在過去鍛鍊與培養的基礎上加以提拔，再在提拔之後繼續加以鍛鍊與培養的問題。難道在老幹部中，曾經有過那一個老幹部預先鍛鍊培養成爲十全十美的幹部，然後才被提拔的嗎？這是沒有過的，也不會有。如果那樣，我們就一輩子也解決不了幹部問題。至於新幹部，在新的工作崗位上會在工作中發生錯誤與缺點，那是一定不能避免的。只要我們老幹部對新幹部在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有正確的態度，錯誤與缺點，反而能教育新幹部與提高新幹部。

這裏要提起所有老幹部注意的，就是對於新幹部必須在工作中進行耐心的教育工作，既要獎勵他們工作中的成績優點，又要指出他們工作中的錯誤缺點，並告訴他們如何發揚成績優點，與糾正錯誤缺點的方法。平時只知道使用，不知道教育，一見工作中有了錯誤，也不加教育，就一脚踢開的辦法，都是不對的，是一輩子也培養不出新幹部來的。過去在平運中對新幹部所採取的「搬石頭」「跳圈子」的辦法，都是錯誤的，今後再不能重複。今後在大量提拔新幹部的過程中，我們老幹部不但不應放棄教育新幹部的責任，而且更應加強我們對於新幹部的教育工作。培養新幹部是一件需要極大耐心的細緻的工作，又是最有意義，最有結果的工作，決不能粗心大意，馬虎從事的。如果我們今後在黨內外能很好加強對於新幹部的教育，正確的發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用各種方法密切幹部同羣衆的聯

系，我們相信，新提拔起來的幹部，一定會很快進步，對於他們所負擔的工作也一定會勝任愉快的。

應該克服一切忽視與輕視新幹部，不敢提拔新幹部的偏向，真正做到這次東北局高幹會的決定，在最短時期內使區級幹部都是新幹部，把縣級幹部除縣長、縣委書記、公安局長、及少數縣委部長，個別縣府科長外，也由新幹部來充任，並在各種工作部門中增設新幹部的副職，給新幹部以學習的機會。同時根據東北局決定，在各省縣市大規模的開辦黨校，訓練班，專門學校，大批的培養新幹部，把他們提高一步，使他們能擔負更多的工作。只有如此做去，我們才能真正按照東北局的決定，把大批的老幹部抽調出來，派到新收復的城市與新收復的地區去做領導的工作。否則幹部困難問題，我們就無法解決，因而我們也就無法完成新形勢向我們提出的新任務。

新的任務與新的力量

列 寧

編者註：這篇文章是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三月八日寫的，當時俄國正進入大革命。列寧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完成新的任務的新的力量的問題，並極精闢的解決了這個問題。望讀者聯系本報今日社論即「大量提拔與培養新幹部」，加以研究。

當時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其中有兩派：一派為布爾什維克（又名多數黨），即真正的俄國無產階級政黨，以後改名為共產黨，以列寧斯大林為首；一派為孟什維克（又名少數黨），為俄國的一種小資產階級政黨。列寧在這篇文章中所批評的「機會主義理論」，即是指的孟什維克派的理論。

俄國羣衆的工人運動底發展，在與社會民主黨發展相聯系上看來，是以下述三個非常重要的過渡為其特徵的。第一個過渡是從狹隘的宣傳小組進到在羣衆中的廣泛經濟鼓動；第二是進到巨大範圍內的政治鼓動和公開的在街道上的示威；第三是進到真正的國內戰爭，進到起義。其中每個過渡都由於以下兩方面準備起來的，一方面是由於主要按照一個方向進行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由於在工人階級生活條件上和全部心理狀態上發生深刻的變化，由于日益增多的工人階級階層被喚醒起

來參加更自覺、更積極的鬥爭。這些變化有時是寂然無聲地發生的，無產階級聚集力量是在幕後、暗中進行的，而往往引起知識份子對於羣衆運動的鞏固性和生命力的失望。然後進到了轉變關頭，全部革命運動好像一下子昇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在無產階級及其先進部隊社會民主黨之前實際地提出了新任務，爲要解決這些新任務好像從天上降下了新力量，這些力量在轉變的前夜都還沒有人猜想到。但是，所有這一切，並不是一下子發生的，不是沒有動搖，不是沒有社會民主黨內各派別間的鬥爭，不是沒有那種向着陳腐了的，似乎是久已死滅和埋葬了的觀點的倒退。

現在我們黨又正經過着這樣的一個動搖時期。爲要使我們的策略和組織適應於新的任務，必須克服什麼「高等形式的示威運動」（地方自治局運動計劃），或什麼「過程組織」的機會主義理論之抵抗，必得進行鬥爭來反對那些害怕「指定」起義，或害怕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民主專政的動心理。運動的進程，在這一次也會把那些陳腐了的和無生氣的觀點的餘毒掃蕩掉，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這種掃蕩應當還不僅限於駁斥那些舊錯誤，而還需要在無可比擬的更大程度上進行積極的革命工作，來在實踐上實現新的任務，來吸引那在現時正在如此大批的湧上革命舞台的新力量，到我們黨方面來和使我們黨利用這些新力量。正是這些積極革命工作問題應當是將近開會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即布爾什維克的黨大會——編者）工作的主要課題，現在我黨全體黨員在其地方工作和一般工作上都正應當將其一切思慮集中到這些問題上。什麼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任務，我們在大體上已屢次說過了，即是：擴大鼓動到城鄉貧民的新階層中去，創立更廣大的、更靈活的和更堅固的組織，準備起義和武裝

人民，爲了這些目的而與革命民主派訂立協定。什麼是實現這些任務的新力量——對於這一點的極好的說明就是關於全俄到處發生總罷工的消息，關於罷工和關於青年、一般民主知識份子，和甚至許多資產階級份子都發生革命情緒的消息。這些巨大的新生力量底存在，特別是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這些力量底存在——就是使新任務可以解決而且一定會解決的充分保證。擺在我們面前的實踐問題，首先在於究竟怎樣來利用、指導、統一、組織這些新力量，究竟怎樣來把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到當前時局所提出的新的更高的任務上去，同時並不忘記那些舊的和通常的任務，這些任務是當資本主義剝削世界存在時始終會擺在我們面前的。

(中略)

革命時代之對於社會民主黨正如同戰爭時期對於軍隊一樣。必須擴大我們軍隊底幹部，把它從平時編制變爲戰時的編制，動員後備軍和預備軍的戰士，召還休假的軍士回軍服務，整理新的輔助的軍團、支隊和其他附屬隊伍。不要忘記在戰爭中必然而且必須要用較少訓練的新兵來補充自己的隊伍，常常要用普通兵士來代替軍官，必須把升調兵士爲軍官的手續加速和簡單化起來。

直接了當說：必須極力擴大所有一切黨的和接近黨的組織，以便稍稍跟得上百倍增漲的人民革命毅力的巨流。自然，這不是說應當把那堅持不移的訓練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教育擱置一旁。不是的，可是應當記得，現在軍事行動本身在訓練和教育事業上有了更大得多的意義，因爲這種軍事行動正是在我們的方向上，完全在我們的方向上來教育沒有受過訓練的人們。應當記得，我們對馬克思

主義的「原理性的」忠實態度，現在正由革命事變進程到處給予羣衆的實物課程所鞏固着，而這些課程正是證實我們的信條。因此我們所說的不是放棄信條，不是減弱我們對於那些游移不定的知識份子和華而不實的革命家們所持的不信任與猜疑態度，完全相反的。我們所說的是關於傳授信條的新方法，社會民主黨人忘記這些新方法便是不可容許的。我們說，現在非常重要的是利用偉大革命事業的明顯教訓來向羣衆——已經不是向小組——傳授我們舊的「信條式的」課程，例如，必須在實際上把恐怖手段和羣衆起義溶合起來，例如，應當善於看見那藏在俄國開明社會的自由主義後面我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參看『前進報』第三期上關於本問題與社會革命黨人的辯論）。

所以，並不是說削弱我們社會民主黨的嚴格要求態度與我們正統的不調和態度，而是要用某些新的道路、新的教育方法去鞏固它們。在戰爭時候，應當直接在軍事行動上來教育新兵。同志們，更大胆些來採用新的教育方法吧！更大胆些去日益增多地組織新的戰鬥隊，派遣他們去進行戰鬥，吸收更多的青年工人，擴大一切黨組織底通常範圍，從委員會起直到工廠小組、職業支部、學生小組爲止！要記得在這個事業中我們的任何延緩都會是有助於社會民主黨的敵人，因爲新的水流急於尋找出路，而如果找不到社會民主主義的河床，它們就會沖入非社會民主主義的河床中去。要記得，革命運動的每個實踐步驟將必然而不可避免地正是以社會民主主義的科學（即共產主義的科學——編者）來教育青年新兵，因爲這個科學是建立在客觀正確地估計各個階級的力量和趨向的基礎上的，而革命却正是舊的上層建築的破壞和力圖按自己意向創立新的上層建築的各個階級的獨立行動。絕不要把我們的革

命科學降低到僅是一種書本上的信條，不要拿什麼過程策略、過程組織，這類辯護散亂、遲疑的、消沉的可鄙詞句來糟蹋我們的革命科學。讓各種不同的團體和小組有更多的自由來進行各種各色的活動，記着，它們道路的正确性，除開我們的忠告，和不管有否我們的忠告，定有革命事變進程本身強的要求來作保證的。早已說過，在政治上常常要向敵人學習。而在革命時期敵人總是特別有效地和迅速地強迫我們做出正確的結論。

「組織起來呵！」這個口號，是布爾什維克派擁護者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曾想用完備形式規定的，現在應當把它立刻實現起來。如果我們不善於大胆地倡首建立各種新的組織，那麼，我們就應該放棄那想担任先鋒隊作用的空洞野心。如果我們軟弱無力的停止在獲得的委員會、團體、協會、小組等等的界限、形式和範圍中，那就是以此證明我們自己庸碌無能。現在，不由我們發動而到處發生着的小組何止幾千，都無任何一定的綱領和目的，而簡單是受着事變的影響。必須使社會民主黨人負起責任來盡可能與更多的這樣小組建立和鞏固直接的聯系，必須使社會民主黨人給這些小組以幫助，用其積蓄的經驗和知識去啓發他們，用其革命的創造性去鼓舞它們。讓所有一切這樣的小組，除了自覺的非社會民主主義的以外，或者直接加入黨，或者作爲接近黨的組織。在後一種情形下，就不應當要求它們接受我們的綱領，也不應當要求它們一定要與我們發生組織上的關係，只要是它們懷有革命的情感，抱着幫助與專制制度鬥爭的願心，就足夠使這些接近黨的小組在社會民主黨人對它們的積極鼓舞下，在事變進程底督促下，起初造成爲社會民主黨底民主主義的助手，然後就成爲它的有

堅強信念的黨員。

人材多得很多而同時又沒有人材，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生活和組織需求間的矛盾是早就可用這個矛盾公式來形容的。這個矛盾，在現在表現得特別厲害：到處都一樣時常聽到渴望新的人力的呼聲，埋怨在組織內缺乏人材的怨言，同時却是到處遍地都有極多的人力自請效勞，青年的力量，特別是工人階級中的青年力量正在長成起來。實踐的組織家，在這樣條件下而埋怨缺乏人材，這就陷入到如同法國大革命最高發展時代羅蘭夫人所陷入過的同樣的幻夢中。羅蘭夫人在一七九三年寫道：法國沒有人，遍地都是些侏儒。誰這樣說，誰就是只看見樹、而不看見樹林，誰就是承認，他已被專變弄得眼花目亂，不是他這個革命者在自己的意識和活動中支配着事變，而是事變支配着他，事變壓倒了他。這樣的組織家，倒不如滾開去好些，讓位給青年人材，這些青年人材是常常能以其熱力來補償其經驗的不足的。

人材是有的，革命的俄國從來也沒有像現在一樣有這樣衆多的人材。革命的階級從來也沒有像現代俄國無產階級一樣有這樣非常順利的條件，——這就是就暫時的同盟者、有覺悟的朋友和無意的助手方面來講。人材多得很多，只是須要拋棄那些尾巴主義的思想和格言，只是須要讓開創力和首倡性，「計劃」和「謀略」能自由發展，而那時我們才配當偉大革命階級的代表，那時俄國無產階級才會如它開始革命時那樣英勇地把整個俄國大革命進行到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東北日報）

反對局部觀點樹立全局觀點

根據於目前形勢和黨內狀況的科學分析，黨的中央在全黨領導幹部面前指出了忽視革命理論的經驗主義傾向已成為黨內幹部思想上的主要危險，提出了在領導機關領導幹部中反對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任務。目前形勢的急劇發展，要求我黨幹部的思想與作風的迅速轉變，以適應於新形勢，而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工作法則障礙這個轉變，抵抗這個轉變，使我們幹部的思想在新形勢中不能提高一步，前進一步。尤其是因為經驗主義的存在，成為黨內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無政府狀態存在的思想基礎，使黨在新形勢面前加強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的工作受到極大的阻力。提到我們面前的問題，是這樣的尖銳，這樣的嚴重，只有反對了經驗主義，克服了經驗主義，才能在一切領導機關、領導幹部中加強和提高理論與政策和策略觀點的學習，黨的思想、黨的組織、黨的工作之迅速轉變才能順利完成，幹部的思想才能適應於新形勢的要求，我們黨才有力量來推進和指導形勢的繼續發展，也只有這樣，我們黨內思想才有統一的基礎。因此，批判經驗主義是我黨領導機關領導幹部在思想領導上一個戰鬥的任務，它與當前黨的政治任務密切相結合，是目前改進工作的主要關鍵，它有着非常實際的政治的意義。

毛主席說：「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它們都只看到

片面，沒有看到全面」。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是思想上的片面性，都是由思想上的片面性產生了思想上的主觀性；所不同的，教條主義思想上的片面性主觀性，是由「脫離具體實踐」不聯系實際這一極端發生，而經驗主義思想上的片面性主觀性，則是由「以局部經驗誤認爲普遍真理」不聯系理論那一極端發生，所以毛主席說：「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

經驗主義思想上的片面性，在全局和局部關係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就是它不適當地和誇大地強調特殊性、局部性、民族性，並且不正確地認爲他的局部就是全部，由此形成了他的主觀性。自七大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規定毛澤東思想爲全黨的指導思想以後，應當說，我們黨內是沒有人公開的反對毛澤東思想了，沒有人公開的違抗中央的政策路線了。可是，犯有經驗主義思想毛病的同志，却經常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因爲不適當地強調特殊性、局部性、民族性，而脫離了毛澤東思想，違背了中央的政策路線；他們經常因爲缺乏全局觀點、整體觀點和國際主義觀點，而習慣於把局部和全局對立，個體和整體對立，或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對立，發生了本位主義、地方主義或民族主義。因此在工作上正如中央所指出的，他們因爲「將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而「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的政策和策略，執行他們自以爲是的違背統一意志和統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這種同志通常也願意「承認」中央的或上級的政策策略的「一般正確」，也往往聲稱「貫徹中央的路綫」，但却經常藉口地方性、特殊性，藉口他所謂的「從

實際出發」或「從特殊情況出發」，把「從實際出發」和中央的或上級的政策策略對立起來，不精細研究中央文件，割裂中央的或上級的政策指示，接受其合味口的東西，拋棄其不合味口的東西，往往執行其違背中央的政策指示的另外一套。他們脫離理論指導而談實際，把理論與實際相對立，結果在實際中蒙頭轉向，失去方向。但是他們却有時將其局部經驗，羅列起來，不加分析，不加批判，誇大爲「理論」，自命爲「創造」，以「搞出一套」而自傲自得。

我們的黨是創造性的黨，它以創造性的馬列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它要求全黨黨員和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用生氣勃勃的創造精神和創造才能來對待我們偉大的事業，要求他們在貫徹和實現中央的一切政策策略中發揮生動的豐富的創造性。但是，一切經驗都證明：如果我們不緊緊掌握馬列主義思想的武器，如果我們不緊緊掌握毛澤東思想，不精細研究中央文件，如果不以馬列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和中央文件來指導實際，不把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密切結合，如果不以局部服從全局，以個體服從整體，則任何人都將一無所成，則一切所謂的「理論」或「創造」，都必將有害於人民，有害於革命。對於某些既脫離馬列主義，脫離毛澤東思想，脫離中央的政策路線，又以自己的一點狹隘經驗自高自大，而妄想「搞出一套」的人們，在這裏，是尤其值得特別警惕的。

脫離了馬列主義理論想自己另外「搞出一套」，脫離了毛澤東思想來談創造，脫離了全局來強調局部，這是一種危險的反馬列主義的傾向，是一種危險的反唯物辯證法的傾向。斯大林在聯共黨史中指示我們：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有內在聯系的整體」。「辯證法認爲自然界中任何

一種現象，如果把它孤獨拿來看，把它看作與其週圍現象沒有聯系的現象，那它就會是不可理解的東西；「反之，任何一種現象把它看做是與週圍現象密切聯系而不可分離的現象，把它看做是週圍現象所制約着的現象，那它就是可以瞭解，可以論證的東西了」。辯證法的事物的聯系觀點，就是事物的整體觀點全局觀點，脫離了整體觀點，則一切個體都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破壞了全局，則一切局部都不能存在。馬列主義思想之所以有力量和生氣勃勃，首先就在於：只要我們掌握了它，我們就可理解一切事物和現象的內在聯系即事物和現象的規律，並可掌握這種事物和現象的內在聯系即事物和現象的規律，使我們的事業循着自覺的方向前進。任何一個領導機關，任何一個領導幹部，只要他脫離了馬列主義思想，他就無法理解事物的內在聯系，無法理解事物的規律，他就無法理解全局和局部，他的理解就不能是全面的，只能是片面的，他的工作就不能是自覺的，只能是盲目的。毛澤東思想之所以必須為我們一切幹部所掌握，中央的政策策略之所以必須為我們全黨所遵行，就是因為毛澤東思想和中央的政策策略，是中國革命全局的正確理解，是中國革命整體利益的體現。任何一個領導機關，任何一個領導幹部，只要他脫離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央的政策策略，則將使他無法保持中國革命的全局觀點整體觀點，因此也就無法正確理解他的局部，無法使他的局部擺在適當的正確的位置，其結果是有害於全局，也有害於局部。不是很明顯了嗎？我們農村的土改工作，因為違背了毛澤東思想中，關於團結百分之九十的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勢力這一完整的指導思想，我們不恰當的強調了東北農村情況的特殊性，結果使我們對東北農村各階級的了解和對各階級的政策，特別是對中農和富裕中農的了解

和對他們的政策，發生了嚴重的原則性的偏向；糾偏以後，則因為我們掌握了這一指導思想，結果才使我們黨的農村工作走上了正確的軌道。

所謂全局觀點或整體觀點，實質上就是用馬列主義的階級觀點，去分析社會中各個階級之間的內部聯系，分析無產階級和各階級之間的內部聯系，並根據這個分析，來正確地製定無產階級對各個階級的政策，正確地製定黨在每個歷史階段中的總路線總政策。我們黨在當前歷史階段中的總路線總政策，是毛主席說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我們當前歷史階段中的全局觀點，也就是我們當前歷史階段中的階級觀點。我們黨在當前土改中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是毛主席說的：「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這就是當前土改工作中我們的全局觀點，也就是當前土改工作中我們的階級觀點。很顯然，這種全局觀點階級觀點與經驗主義的局部觀點和狹隘的階級觀點，是完全不同的，截然相反的。經驗主義的局部觀點和狹隘的階級觀點的特點，就是他不能了解社會中各個階級之間的內部聯系，不能把無產階級和其他一切階級聯系起來看，他把無產階級從社會中其他一切階級孤立起來，使無產階級的利益和其他一切階級的利益相對立，使無產階級眼前利益和將來利益對立，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對立，局部利益和全部利益對立。這在平分運動中在一些地方有了充分的表現，他們把僱貧農從農村中其他一切階級對立起來，不恰當的提出「僱貧農說了算」，過份的強調「高度滿足僱貧農要求」，並且還自以為是的以此為十足的堅強的階級觀點。其結果，只是使黨和僱貧農在農

村中陷於孤立，要是沒有中央和東北局糾偏指示的發出，則僱貧農不但要失去長遠利益，而且也要損害暫時利益。這個痛苦的教訓應當引導我們去記取列寧的指示，列寧說：「當工人還沒有學會用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估計所有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活動和生活中所有各方面的表現時，工人羣衆底意識是不能成爲真正的階級意識的」；「因爲工人階級底自我認識是與那種不僅在理論上——甚至與其說是在理論上，不如說是根據政治生活經驗——完全明確理解現社會所有一切階級相互關係的認識緊相聯系的」（「做什麼？」重點是列寧自己加的。）這裏說的是，只有完全明確瞭解現社會所有一切階級的相互關係時，工人階級的意識才能成爲真正的階級意識。由此可知，只有具備了馬列主義的全局觀點，整體觀點，才能有馬列主義的階級觀點。因此，馬列主義要求共產黨人具有全局觀點或整體觀點，實質上就是要求他具有堅強的階級觀點，就是要求他具有嚴肅的總路線觀點總政策觀點。

經驗主義往往用他的「從特殊情況出發」或「從具體實際出發」來違背黨的總路線總政策，以此拒絕別人根據總路線總政策對他的錯誤的批評，並且說別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當然這是一種錯誤，這是一種對毛澤東思想學說的歪曲。因爲毛主席在他指出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裏担負指導工作，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後，緊接着就指出了：要「有意識的有計劃的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方法」（「農村調查」序言二），這裏所說的最基本方法，不是別的方法，而正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做典型的周密調查。離開馬列主義的領導，來談「從特殊情況出發」，

去做調查研究，就不可能對特殊情況有正確的了解和正確的分析，就不可能有正確的調查研究。應當予以說明，予以指出，經驗主義的「從特殊情況出發」，實質上是從狹隘經驗出發，是從片面情況出發，是從現象出發。馬列主義需要典型調查，也需要「從特殊情況出發」，目的是爲了從典型中研究一般的規律，爲了理解一般的規律是採取怎樣的特殊形態而表現而存在，爲了在實現總路總政策時，尋找出這一種或那一種適合於當時當地特殊情況的執行方法或工作方法。但經驗主義却不能這樣做，他爲現象所迷惑，爲特殊所矇蔽，他不能從典型中看出規律，不能從具體的事物中認識出一般的本質的東西；但却把特殊當成一般，把片面當成全面，把現象當成了本質。

經驗主義往往把他的片面群衆觀點當作「從羣衆出發」的羣衆觀點，並且自認爲他的作法他的思想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當然這是一種錯誤，這是一種對毛澤東思想學說的歪曲。實際上，經驗主義的傾向往往是尾巴主義的傾向，因爲他沒有深刻理解毛主席的「從羣衆中來」，「這就是說，將羣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爲集中的系統的意見）」（見「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這就是說要我們清醒地分析羣衆的意見。屬於正確的，則領導羣衆予以實現，屬於錯誤的，則進行說服，教育羣衆予以改正。經驗主義如此相反，它因爲脫離了一般理論的指導，脫離了階級分析的方法，而認爲羣衆中的一切意見都是對的，崇拜羣衆的自發性，忽視黨對羣衆的領導，結果使他自己變成尾巴主義。經驗主義的傾向又往往是命令主義的傾向，因爲他不深刻懂得毛主席的「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把集中起來的意見，「又向羣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爲羣

衆的意見，並使羣衆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羣衆行動中放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同上）。經驗主義與此相反，他往往把羣衆中少數人的意見誤當作多數人的意見，他往往把羣衆中脫離長遠利益的目前利益的意見集中起來，他把這種自己集中起來的局部經驗當成普遍真理，命令羣衆予以實現，並固執己見，碰了釘子，也不知改正，不想改正，結果使他自己變成命令主義。

經驗主義往往又以他一時一地的成功，當作他有普遍解決實際問題的本領，而自命不凡，自傲自得。當然這是一種錯誤，這是一種片面的自我的誇大。因爲第一，他一時一地的成功，往往是由中央或上級全局領導的正確而來，他眼光短小，對於這種全局領導沒有自覺，看不見全局領導的正確，而因其一時一地的成功產生了自我的誇耀。應懂得，一時一地的成功，只有以虛心態度相對待，才有真實的價值。第二，他不懂得他一時一地的成功，不能適用於另一時間另一地點另一條件，但他却把這種局部的東西誤認爲普遍的東西，而到處硬搬硬套。第三，特別危險的，有時他的所謂一時一地的成功，他的所謂能解決問題，實際上是製造問題，是犧牲整體來滿足個體，是破壞全局以解決局部，是損害組織以發展個人。例如說：在財政經濟上的，拆毀大工廠，建設小工廠；封鎖糧食出口，破壞自由貿易；自立關卡，妨礙國家稅收統一，阻礙商品資源流通；佔用鐵路車皮倉庫，妨礙國家交通運輸；投機搗把，大做生意，破壞金融，混亂市場；以及土改工作中的允許農民進城，抓人挖浮，侵犯工商業，造成工農對立，等等過去諸如此類的事情，在當時在當地，不都是曾被某些同志自認爲解決了問題嗎？然而實際的結果呢，都是局部突出，危害了全局損傷了全局的。

由於強調局部性，缺乏全局性，由於局部與全局的關係擺得不適當，由於沒有以局部服從全局，經驗主義在有關這類的問題上，發生出一連串的錯誤和偏向。在大公小公的問題上，不是以小公服從大公，而是因為小公而害大公；在公私關係上，不是公私兼顧，公私兩利，而是只顧私而不顧公，甚至以私害公；在組織上，不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集中統一，而是無紀律狀態無政府狀態的地方主義；在幹部問題上，既不大量培養新幹部，亦不用心提高老干部，對幹部的認識，不是只看到他的成績而不看到他的缺點，就是只看到他的缺點而不看到他的成績，不是只看到他的過去而沒看到他的現在，就是只看到他的現在而沒看到他的過去，更不用說看到他的將來，總之缺乏全面的歷史的認識幹部的觀點；在問題的看法上，不是既照顧今天又照顧明天，而是只照顧今天而不照顧明天；在工作的處理上，不是以大道理管小道理，而是以小道理整扭大道理。

一切共產黨員都應當是胸襟寬廣，眼光遠大的人物，都應眼睛向前看，不應向後看。但只有當我們在處理一切問題時（即使是小問題），都能從革命的全局利益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局部的地方的利益，尤其不是從個人利益出發時，我們才能獲得這一良好的品質。由此可見，爲了我們政治上不犯錯誤，爲了在新形勢急劇發展變化中，不致迷失方向，不致成爲盲目者，我們就應當批判經驗主義的局部觀點，樹立馬列主義的全局觀點，就應當批判經驗主義的狹隘的階級觀點，樹立馬列主義的階級觀點，就應當批判經驗主義各種各樣的藉口，把毛澤東思想在我們幹部中牢固地樹立起來。

當然，說要反對局部觀點樹立全局觀點，並不是說局部不重要，不是說從此就不要管局部了，因為全局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而存在，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全局觀點之所以成爲必要，是正像毛主席指示的：「在於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在於局部性的東西是屬於全局性的東西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於使我們的幹部善於從全局觀點出發，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用以加強一切局部問題的處理。

（東北日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專論）

經驗與經驗主義

經驗主義要不得，一定要反對，不僅是因為他對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態度是錯誤的，有害的，就是他對待具體實踐實際經驗的態度也是錯誤的，有害的。

經驗主義者每以具有實際經驗而自豪，但是究竟他是怎樣對待了實際經驗呢？有各種各樣的經驗。有一種經驗是前進階級前進意識在我們黨內幹部思想上的反映，他的作用是促進我們黨的工作和思想的發展，促進我們黨的工作和思想的前進，這是一種好的經驗，是應當為我們所掌握的经验；有一種經驗是落後階層落後意識在我們黨內幹部思想上的反映，它的作用是阻礙我們黨的工作和思想的發展，阻礙我們黨的工作和思想的前進，這是一種壞的經驗，是應當為我們所拒絕的經驗；同時，在這一時間地點條件，對我們的工作和思想起促進作用的經驗，在另一時間地點條件，則可能是對我們的工作和思想起阻礙作用的經驗，因此應當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條件下，區別使用不同的經驗。

區別經驗的好壞，區別不同情況、區別使用不同的經驗，這就要分析，就要馬列主義。

但是、經驗主義由於它忽視理論的重要意義，脫離了馬列主義理論的指導，它就失去對實際及實際所產生的經驗的分析能力，它不能區別經驗的好壞，更不能區別不同情況區別使用不同經驗。在紛

紅繁雜的現象面前失去分辨能力，不能用分析的方法在大量的現象中找出原則性的東西，不能用馬列主義去分析具體情況與具體經驗，它也只好現象羅列，甲乙丙丁，和教條主義一樣地來開中藥舖。不是把一切實際中所提出的大小問題都當做經驗，就是把一個局部的在一定具體條件下的局部經驗當做普遍性的經驗來提倡，把一切片面的偶然的現象當成經驗，把假經驗當作真經驗，壞經驗當作好經驗，舊經驗當作新經驗。

其次，革命的專業天天在前進，革命的工作天天在發展，換句話說，情況天天在變化。變化着的情況隨時向我們提出新問題提出新任務，新事物天天代替着舊事物。它向偉大事業的創造者——共產黨人提出了這樣的要求：隨時以新經驗代替舊經驗，隨時從我們所習慣的、熟識的、甚至迷戀着的，但已沒有發展前途的舊經驗中解放出來，去迎接那些不習慣的、生疏的、迫切需要理解的、但有發展前途的新經驗。

因為：「在辯證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那怕它現時似乎還不堅固，因為在辯證法看來，只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聯共黨史）

這就是說，我們需要具有事物的發展觀點，我們需要具有對新鮮事物的敏銳感覺。

但是，經驗主義者由於他忽視理論的重要意義，脫離了馬列主義理論的指導，他就失去了事物的發展觀點。他不善於看到未來，老是墨守成規，不能依靠那種目前看來似乎幼小，但却正在上升着的

事物，他滿足於自己已經獲得的東西，而不願繼續向前進步。他不能批判地估價自己的經驗，不能經常檢查自己的經驗是否適合於新的任務新的要求。他把自己已經做過的東西，看做定型的總結，因此漠視別人的別地的經驗，特別不能很注意地傾聽羣衆的呼聲，不能把零碎的經驗普遍化系統化。他對新鮮事物失去感覺，所以特別保守、固執、僵化，反以此為滿足，表現成爲思想作風上的阿Q主義。

再次、實際經驗，這只是認識過程的開始，而不是認識過程的完成。正如毛主席所說的，經驗很多，雖很可寶貴，「但如果就以經驗爲滿足，那也很危險。」因爲，「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於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與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的不完全。」而「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整頓黨風黨文風）

要想獲得完全的知識，對於只有實際經驗的同志，就必須對自己的經驗加以綜合加以條理化，加以分析。思索，就必須使我們對事物的認識不停止於或不滿足於感性認識的階段，而是從感性認識再進入理性認識的階段，換句話說，就是必須加強理論的學習，必須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對自己實際經驗的指導。

毛主席在論到戰略問題時，關於認識過程會這樣草率地指示我們：「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與必要的偵察並對各種偵察材料作聯貫起來的思索。這裏是敵方情況的各種表現，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與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

察得來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對比着看相互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對於建設每個戰略戰役或戰鬥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過程。」又說，「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見之於軍事計劃建設之前，而且也見之於軍事計劃建設之後。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又是一個過程，一個新的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現，發生重新檢查的問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只有經過這種「作聯貫起來的思索」，所獲得的知識，才是完全的知識，只有經過這種「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所獲得的知識，而又經實踐所考驗的知識，在實踐中經過重新檢查被證明是正確的知識，才是事物之規律的知識，才是普遍的知識。當我們的認識還停止在感性認識的階段時，即使這種知識是為實踐考驗的知識，我們對事物的認識也還只是現象的認識，還只是事物表現出來的具體形態的認識，我們還沒有透入事物的本質，還沒有認識事物的規律。只有我們的認識由感性的認識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而這種知識又被實踐過程證明為正確的知識時，我們才真正由現象透入到了本質的認識，才真正由事物之具體形態的認識達到了事物之規律的認識。這時，我們才能在必然的、內在的、有規律的聯結中認識了事物；這時，我們的認識才接近了真理，我們的認識才具有了普遍真理的意義。所以列寧說：「思維雖然是具體的東西上升到抽象的東西，但如果這思維是正確的，那它就不離開真理，而是接近真理了。」又說，「一切科學的（正確的、真實

的、合理的）抽象，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了自然的，由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惟，又從思惟到實踐——這就是認識真理，認識客觀實在性的辯證法的過程。」（哲學筆記）

教條主義不認識這個辯證法的認識過程，脫離具體實踐空談理論，把認識過程分割，把逆行的片面的知識當作了完全的知識。結果使他自己變成「連聲讀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放出去」的古董鎗專家，變成爲「一無的放矢」，亂放一通」的魯莽無知的盲目者。經驗主義也不懂得這一點，脫離普遍真理，降低理論的意義，把認識過程分割，把低級階段的知識當成高級發展階段的知識，也把另一種片面的知識當成了全面的知識，因此使他對事物的認識停止於或滿足於低級的感性認識的階段，甚至看不起高級發展階段的理性知識。因此，在實際工作中，經驗主義以現象的感性和一知半解爲滿足，不願深究窮追，不願打開腦筋，不願用心思索，不能透過事物的現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質，對一切事物都不能獲得規律的認識。所以，經驗主義的思想不明確，眼界不開朗，立場不穩定，不能在現象和事物的大海中間做一個好的游泳家，他常常在大量的現象和事物中被淹沒了。和教條主義一樣，經驗主義是我們黨內一種閉塞頭腦窒息思想的惡劣傾向。

我們黨之所以強而有力，生氣勃勃，就在於我們的黨是以馬列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知識武裝自己。馬列主義武裝了我們的黨，就使我們黨得以通曉社會發展的過程，看到社會發展的過去和未來，今天和明天，預見事物的發生和發展，科學地分析具體情況和綜合實際經驗。這就使我們黨能從中國千百萬人民的利益和各革命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的觀點來觀察問題，確定方針，製定政策。這就使我

們的黨在政治上有着高度的原則性，明確性，和高度的鬥爭性，對於任何損害中國人民利益的傾向，對於一切稍覺脫離黨的原則、思想和政策的傾向，得以進行嚴肅的不懈的鬥爭。

既然以感性知識為滿足，自己解除了馬列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的武裝，經驗主義就被注定了，不能正確地發現中國革命的全局利益，不能正確地認識中國革命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所以經驗主義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有高度的原則性、明確性，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鬥爭性。所以，一方面，經驗主義就經常與自由主義相聯系。他經常立場不穩，左右搖擺，在處理問題時，既不是贊成一方面，也不是反對一方面，而是覺得這一方面也對，那一方面也對，認為着個經驗也好，那個經驗也不錯，他可以承認且贊成一切觀點，也準備調和與結合一切觀點於一爐，是非不能分明，主要次要不能分清；因為缺少明確的原則立場，失去對事物的分析能力，於是，他就只好經常以模稜兩可的態度，唧唧哈哈的腔調，夾應付一切了。另一方面，經驗主義又經常與「左」右機會主義相聯系。「他們似乎自居為經驗的萬寶箱，在裏面貯藏着各種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經驗，而對這些經驗的正確與錯誤，並不加以分析。只看你要什麼，就拿出什麼來。」（艾思奇：反對經驗主義）。在「左」的傾向佔上風的時候，他成爲「左」的俘虜，在右的傾向佔上風的時候，他又充當右的尾巴，特別危險的，他對於這種無原則性的妥協，的庸俗態度，沒有自覺，反自以爲任何時候都「立於不敗地位」，「都是站在正確方面」，不知道加以改正。

既然以感性知識為滿足，自己解除了馬列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知識的武裝，經驗主義就被注定了。

了，在工作作風上和工作方法上，不可能有主動性、創造性，不可能有計劃性。「自由是必然性的被認識」，馬列主義者之所以能在改造世界這一偉大事業中，表現出翻天覆地的本領，它的基礎就在於我們正確地認識世界，自由的行動就是根據必然性的認識，根據發展底一般方向的認識的行動。列寧說：「當我們不知道自然規律的時候，它是獨立地在我們意識之外存在着和作用着，把我們變成「盲目的必然性」底奴隸。但是當我們知道了不依賴於我們的意志和意識而獨立作用着的這個規律的時候，我們就成爲自然底主人」（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經驗主義的思想和工作，沒有前途，毫無創造的主動的能力，其原因是很顯然的，這就是由於他不知道自然界和社會中客觀存在的規律，而成爲「盲目的必然性」底奴隸，由於他還沒有成爲自然的主人。

有的時候有的地方，經驗主義者表現爲迷失方向的事務主義者：忙於瑣碎事務，忙於眼前工作，企圖一切事情都自己親自去做，包辦一切，代替一切，無法對全盤工作做深思熟慮的打算，不能從大量複雜的日常事務中找出前進的方向，不能動員黨的行政的羣衆的力量爲此方向奮鬥。他們即使想來研究問題和總結經驗，但也因爲不懂得「天下老鴉一般黑」，性質相同的問題，只要深刻研究一個或幾個材料，能說明問題就夠了，就可以解決問題了的道理；硬要去分別是大烏鴉、小烏鴉、肥烏鴉、瘦烏鴉、中國烏鴉、外國烏鴉，這也調查，那也調查，時間雖用了很多，材料也收集了一大堆，但是被材料埋住，從材料裏鑽不出來，結果仍然總結不出經驗，也解決不了問題。這是一種經驗主義總結經驗的方法，是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在調查研究整理材料上的具體表現。很顯然，這是一種

很笨的方法。

有的時候有的地方 經驗主義者又表現爲官僚主義者。因爲他既然以他的局部經驗誤認爲普遍真理，他就認爲沒有必要再去攷查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沒有必要再去傾聽羣衆的呼聲，沒有必要去批判地估價自己的經驗，沒有必要隨時檢查他的經驗是否適合新的任務新的要求，沒有必要去感覺新鮮事物，沒有必要以新經驗代替舊經驗了。他認爲他的經驗已經足夠了，他的知識已經完備了，他可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發號施令」，「高枕無憂」了。

事情是那樣的清楚，用經驗主義的態度對待經驗，其結果是喪失經驗，用經驗主義的態度對待政治，其結果是損害政治，用經驗主義的態度對待工作，其結果是妨礙工作。正是馬列主義，而且只有馬列主義，它教導我們珍貴經驗，重視經驗，它給經驗以生命的活力，使經驗得到提高得到發展。只有加強理論學習，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爲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華山學風黨風文風）。難道我們對於毛主席的這一指示，還有什麼疑問嗎？是到了應當完全肯定回答的時候了。

（東北日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專論）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介紹列寧論學習經濟工作

陳伯達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上所寫的一個題目。毛澤東同志在那裏所寫的是關於軍事問題。從人民解放軍勝利的實際看來，我們全黨響應了毛澤東同志的號召，已經大體上學會了戰爭，雖然在這方面我們還是不能自己滿足，還需要繼續學習，要學習得更多，更好。除了在軍事這一方面應該繼續學習之外，顯然，今天我們特別要提出來學習關於經濟的工作與文化教育的工作。很久以來，毛澤東同志即號召我們學習這兩項工作，我們過去也學習過一些，做過一些工作，並且有過創造，以至是重要的創造；因此，在許多最艱苦的年月，我們渡過了許多經濟的難關，提高了羣衆政治的覺悟。這類成績，是不能夠磨滅的。但是，我們還應該承認：在這兩方面的工作，我們仍然是極端幼稚，有時簡直幼稚得可笑。這是不足怪的：第一，因為我們黨絕大多數的優秀幹部，二十幾年來一直爲軍事與政治工作而奔忙，精力集中在那些方面，而不是在這些方面。當然，在經濟與文化的方面，我們也有優秀的幹部，但比起軍事與政治的方面來是太少了。

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別的什麼有益的工
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
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毛澤東同志這些話已說了好多年，
到了現在，人民是更迫切地需要我們在這些方面的本領了。過去因為所處的條件，我們這些方面的本
領雖然差些，也還沒有特別顯出迫切的危險性來，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已擁有、並且將繼續
擁有大城市與工業區，我們將擁有全國，特別是大部分解放區已消滅了封建，而帶有社會主義成份的
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即帶有社會主義成份的公營企業已日有增加，並且將日益推進其在經濟上的
領導作用（雖然它今天在經濟上的比重還是很弱小的），如果我們——人民首腦的共產黨——還不
去特別努力學習，真正學會經濟工作與文化教育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那末，即使我們軍事上在
全國完全勝利了，我們也還可能在經濟上競爭不過別人，也還可能變成是「一批無用之人，就要被敵
人打倒，就要陷於滅亡。」

47

本年三月間，大公報刊載了一篇通訊，是一個從鞍山出來的工程師的投稿，裏面很嚴厲地批評了
我們，措辭很不禮貌，其中有幾句話，說是：「……對於農村，他們（按：指我們共產黨人）是忽輕
就熟，很有辦法。對於都市，尤其一個工業城市，顯然生疏得很。他們還是非常的缺乏人材，但是鞍
山的共黨當局却不知道收羅人材……」。大家知道：大公報是一個親國民黨而經常藐視我們、反對我

們的報紙，該稿作者也沒有摸清我們民族真正的出路，但是，我們暫且不管這些，上述的幾句話，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並不怕那反對我們的人發現了我們的弱點，也不管人家對我們的措辭禮貌不禮貌；我們所怕的，就是我們不敢正視我們自己的弱點，不肯用力去克服自己的弱點。事實上，在工業城市方面，我們固然『生疏得很』，就在農村方面，我們也不能驕傲自滿，我們也有生疏的東西，我們是有許多東西繼續要學習的，如果學得還不夠，我們在農村中也還可能犯錯誤，如毛澤東同志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就指責了我們曾經在農村工作中犯了一些『左』的錯誤。

在新鮮事物面前，或在生疏的事物面前，誰要賣什麼『革命老資格』，自稱『英雄』，誰就與碰得皮破血流。這真是無學得很的。不管你過去的歷史多末光榮，但在這裏不求長進，就得成爲落伍者。

沒有什麼是可以『生而知之』與『不學而能』的，也沒有什麼是有學够的時候。向誰學習呢？我們的先生是到處可以找到的。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八年論學習的時候曾經告訴我們：『……我們的先生多得得很——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本家、地主、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全世界，他們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同時又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向他們或多或少的學到一點東西。』毛澤東同志這些話對於我們今天各部門的工作仍然保存了全部的價值。就是說：我們要向各種羣衆學習，向同盟者學習，以至向敵人學習。當然，毛澤東同志的意思不是要囫圇吞棗的學習，而是要批判的學習。

由於我們在經濟工作上還不善於學習，還沒有學會很多（當然是從一般來說），我們已嘗過了不

少苦頭。特別是三四年來，我們革命的局面向擴大了，經濟的事情更多更複雜，而我們的進步不夠，甚至有的就把舊的狹小的經驗亂套一頓，我們的苦頭也就嘗得更多，吃虧更大。不少多財善賈的商人，利用我們小生產經濟分散的弱點，還企圖耍弄投機和操縱市場的舊把戲，並且因為我們善良，因為我們對這類行業還不精明強幹，他們就欺侮了我們。當然，那些躲在我們領導的公營工業或公營商業的機構內的壞人也欺侮我們老實，覺得我們只會幹政治，不會幹經濟，就把我們的老實看成傻瓜，而甚至發現過這樣的事情，即可以一手把我們的公家貨物從後門運出，另一手就把這些貨物送進別門來賣給我們，同時繼續向我們領取他的薪水。因為我們的生疏，在工業中我們有些同志曾經做過很多荒謬絕倫的事情，不管我們領導的公營工廠有很多優越的條件，但是有些工廠却是在賠本的情況下過日子，競爭不過私人資本，以至於不但是工人，而且也使那些存心的確良善、願意幫助人民事業發展的工程師、技師或善於管理企業的職員，也要為我們搖頭，覺得我們在這些方面還太過於幼稚。

從客觀上說來，我們犯過的許多錯誤，在一定時候是很難避免的，甚至於不可避免的，因為這些事本沒有做過，開頭要做，也就可能錯誤百出。然而經常錯了不改，這就是我們所不可允許的了。我們必須努力改造我們自己。

x

x

x

為了能夠充分說明毛澤東同志關於「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這一個重要的方針，這裏要特別介紹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後，施行新經濟政策的一個時期，關於共產黨人要學習做經濟工作的許多極寶貴

的語言。雖然現在我們和蘇聯是處在不同的革命性質和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但是，如上所說，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已有社會主義成份的國家企業和私人資本主義並存着，而隨着革命局面的擴大，官僚資本的企業越多落入我們之手，變成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企業，同時我們又還面對着極廣大的散漫小生產者的經濟，因此，我們正遇到有重大歷史關係的複雜的經濟問題，而列寧這些關於學習做經濟工作的語言，就好像就是對我們所說的。列寧這一切語言不只是對我們學做生意有益，而且對我們學做各項經濟工作同樣有益。

列寧說：「我懂得，共產黨員爲了學習經商，的確是需要時間的，凡願學習此事的任何人，在起初幾年之間，都會犯嚴重的錯誤的，歷史是會寬恕他的，因爲這種事對他是一件新的事情。」（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在冶金工人聯合會全俄代表大會共產黨黨團會議上的報告）

列寧說歷史是會寬恕我們一些不可避免的錯誤的，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但是，列寧告訴我們：不要在錯誤面前盲目起來。列寧說：

「……最主要的是，要能冷靜地會看出這種錯誤究竟是在那裏發生的，再從頭重新做起。如果我們不只是兩次，而是很多次不得不從頭做起的話，那末，這正表示出我們沒有成見，是以冷靜的觀點來處理我們在世界最偉大的任務的。」（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就是說：我們對人民負責，負有歷史上偉大的任務，要去掉偏見，要冷靜地找到錯誤的根源，敢

於改正錯誤，從頭重新的做法。列寧說：

「如果一切共產黨員，負責的工作人員，都能明白地意識到：我們不會做事，我們必須從頭學起，那時，勝利就一定是我們的了——在我的意見看來，這就是一個最根本的結論。」（同上）

善於學習，則我們一定勝利。這就是列寧的結論。

列寧曾經反覆地描寫了當時俄國解放之後的農民以至工人對於共產黨人的批評與期待：

「……在現時，農民正以信用貸予我們；……他們會說：「好吧，如果你們現在還不能這樣做的話，那末，我們就等一等，也許你們會學會的。」不過，這種信用不能是無窮無盡的。」

「這一點，我們是必須知道的，在獲得信用之後，要立刻着手作的。應當知道：這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不再給我們以信用的時機，它要求兌現（要是用一個商業上的術語來說的話）的時期，日益迫近了。他們將說：「現在就是這樣吧，親愛的統治者們，你們在延期這末多月和這末多年之後，一定能獲得一種最正確最可靠的、幫助我們解脫貧困、痛苦、飢餓及破產的辦法吧。你們是能够有所作為的，這一點，你們也曾經證明過了。」我們不可避免地將要碰到的試驗，就是這樣；歸根到底，這個試驗將要決定新經濟政策的命運及俄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命運的。」（同上）

「資本家是會辦供給的。但是他們作得非常不高明，他們是強盜式地作的，他們侮辱了我們，他們掠奪了我們。那末不知共產主義是何物的單純工人和農民，都是知道這個的。」

「但是資本家總是會辦供給的，你們會嗎？……你們都是一些傑出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你

們所負擔的那事業，經濟事業，你們却是不會作的。」這就是農民——而且通過農民，還有很多工人——在去年（按：指一九二一年）對共產黨所作的最單純最致命的批評。……

「需要來一個真正的檢查。資本家正在俯屈地活動着。他們正在強盜般地活動着，他們唯利是圖，但是他們是作得很巧妙的。」但是你們呢？——你們試用新的方法作一下吧：你們並不獲利，你們的共產主義原則，你們的理想是好極了，這些原則和理想寫得這樣美麗，老實說，你們是理應入天國為聖賢的——然而你們會做生意嗎？——實在需要來一個檢查，一個真實的檢查，這並不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加以調查和責罰的這種檢查，也不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加以懲罰的這種檢查。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這樣的檢查，而是站在國民經濟見地上的那種真正的檢查。

允許共產黨人延期兌現，已經有過好多次了，貸給他們的信用之多，也是任何其他政府所從未得過的。自然，共產黨人曾經幫助農民從資本家與大地主底壓迫下解放了出來，農民是極重視這一點的，因此，他們給了共產黨人以延期兌現的信用，但這種延期，總有一定限度的。……然後，就要來一個檢查的：你們能不能把事情經營的不比別人壞呢？舊的資本家是會做的，而你們却是不會的。」

（同上）

二十五六年前列寧所描寫的農民以至工人對於當時在經濟工作上還很生疏的蘇聯共產黨員所作的批評與期待，現在在我們這裏，也正是遇到了。我們正遇到着類似的批評與期待。很多人批評我們，覺得不但商業，而且工業，資本家要比我們會搞。我們這裏的農民也期待我們在幫助他們從封建半封

建及官僚資本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之後，能够更「獲得一種最正確最可靠的辦法」，繼續幫助他們「解脫貧困、窮苦、飢餓及破產」。我們這裏的農民也期待我們能多供給他們一些物品，期待我們善於把工業和農業聯繫起來，善於把農民在經濟上聯繫起來，並使他們避免投機商人買賤賣貴的壓迫；希望我們要善於和破壞國民經濟的投機商鬥爭。我們這裏的農民也相信我們是能够這樣做的，因為在我們領導之下，他們已親身經驗根本的利益，並相信我們對人民事業的忠心，相信我們的能力。所有中國的人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人是翻天覆地的最能幹最了不起的中國人物，都知道我們什麼都能够學會，並會學得比別人高明，以至可能高出萬倍，只要我們肯學的話。如果中國共產黨人是不能幹的話，中國也就沒有希望了。但是，在我們解放區，不論工人，農民，或其他人民，除了高興我們已經兌現的東西之外，對於其他還沒有兌現的東西，也是期待我們不要延遲時間太久，而且是更快地兌現。當然，我們一些根本的辦法是有的。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同樣地早已指出了我們在進行土地改革之後，繼續解脫農民貧困的道路，可是我們很多地方不會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方針去做，不令具體化，或者做得很粗暴，做得很不切實際，很不耐心，所以就延長了兌現的時間。

毫無疑問：我們也正在碰到試驗，在整個經濟戰綫上（包括工業、農業、商業、金融）的試驗，而這個試驗將要決定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的命運以及將來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命運。

毫無疑問：蘇聯共產黨員在列寧與斯大林的指導之下，結果是學得那末出色，做得那末驚天動

地，那末，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也就一定不會辜負我們中國人民的期待，凡是蘇聯共產黨員能夠做到的，我們便也可能同樣做到，而根本的條件，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要能够像蘇聯共產黨人那樣善於學習。

列寧認爲必須三番四覆地學習，學了不會又學，學了不會又學，一直要達到目的。

「我重複說一遍：由於我們有正確政策的結果，我們從人民大眾那裏獲得了信用和延期兌現，用新經濟政策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期票；但是在這種期票上沒有載着年月日，它們將何時要求兌現，你是不知道的。這就是危險之所在，這就是政治期票和普通的、商業上的期票不同的特點。必須把我們一切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一點上，而不要以爲在一切國營托拉斯及合辦公司中有着負責的和優秀的共產黨員爲滿足，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爲這些共產黨員不善於作生意，他們遠不如在大工廠及大公司中受過訓練的那般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再用那同樣的偉大的俄羅斯語來說，共產黨人的自負心在這裏還依然存在着。問題是在於負責的共產黨員——雖然是最好的，雖然是非常誠實，忠心耿耿的，雖然他曾經忍受過苦役而不畏死難，但他却不會做買賣，因爲他不是一個經營商業的人，他沒有學習過怎樣做生意，也不願意學習，也不了解他必須從A B C學起。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幹過世界上最偉大革命的革命家，一個爲衆目所注視（如果不是爲四十個金字塔所注視，則無論如何是爲歐洲四十個國家所注視）而抱着從資本主義下面解放出來的希望的人——他應當從一個普通的店員學習起，這個店員有十年的商店經驗，他懂得怎樣做生意；而負責的共產黨員與忠實的

革命家，却不僅不知道經營商業，而且甚至他還沒有覺悟到他不知道經營商業這回事。

「因此，同志們，如果我們能把這種初步的愚昧與無知糾正過來，那末這將是一件巨大的勝利。我們在離開這個大會時，應當確信我們還不懂得這一點，以後應從A B C學起。畢竟我們還是革命家（雖然有許多人說——這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我們已經官僚化了），我們能夠理解這種簡單的事情：即是在一件新的非常困難的工作上，應當善於好幾度從頭做起；如果在開始以後，你碰壁了，那末你再重新開始，那怕十次改作，直到你達到你的目的為止。不要因為你是一個共產黨員而裝腔作勢，而再自高自大，要知道一個非黨的店員，也許是一個白黨——我們就確定他是一個白黨——很善於從事在經濟上必不可缺的一些事情，而你卻是不會的。如果你是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有着成百的官職頭銜，又是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功臣」，如果你理解這一點，那你一定能達到你的目的，因為這種事情是可以學會的。

「雖然在過去一年間（按：指一九二一年），我們有了小小的成績，但這些成績是微小不足道的。主要的事情，是一切共產黨人還沒有這種廣泛的認識和覺悟，就是在目前，我們——俄國負責的和最忠誠的共產黨員的這種本領，比任何一個舊式的店員都要差些。我再重複地說一遍：我們必須從頭學起。如果我們認識了這一點，那末，我們的考試是會合格的了。這一考試是很嚴重的，這一考試是由日益迫近的財政危機來舉行的；是由我們所從屬的與之聯系而不能分離的俄國的和國際的市場來舉行的……這一考試是極嚴格的，因為在這裏，人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能擊敗我們。」（同上）

顯然，列寧告訴了我們：首先我們共產黨員要有廣泛的認識和覺悟（聽呵，是廣泛的認識呢，是廣泛的覺悟呢），知道了在這經濟工作方面我們比別人不行，而後我們才會去認真地學習，而後我們的考試才會合格。

因為社會主義與私人資本的「競爭是非常地激烈的」，社會主義必須能夠經得起十分痛苦的財政危機的考試，經得起內外市場的考試，當時列寧是這末警告的：「這一考試是嚴格的，因為在這裏，人家在經濟上政治上都能擊敗我們。」

列寧指出了管理專業的技能與文化程度是相關聯的：

「這裏，須要明白地提出問題：我們的力量究竟在那裏？我們缺少些什麼東西？政治的權力是十分足夠的。這裏未必有人會說，共產黨人，共產黨，在某一個實際問題上，在某一個事務機關當中，是缺少權力的。基本的經濟力量是在我們的手中，一切帶有決定意義的大企業、鐵路等等，都在我們手裏。……缺少什麼東西，這是一目了然的：現在感到缺乏的，是管理國事的那部分共產黨員的文化程度。如果以莫斯科為例——它有負責的共產黨員四千七百人——如果我們拿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為例，那末我們就要問一問，究竟誰在領導着誰呢？我非常懷疑是能否說：那些共產黨員是在領導着這個巨大的機構。老實說一句，並不是他們在領導着人家，而是人家領導着他們。這裏發生的事情，正如同童年時代人家講給我們的歷史故事，人家教我們說，有一個時候，一個民族征服了另一個民族，戰勝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則成了戰敗者。這是很簡單明瞭的。但是這些民族的文化

如何呢？在這裏，事情就不大簡單了。如果戰勝的民族，其文化高於戰敗民族，則前者迫使後者接受其文化；在相反的場合，則戰敗的民族迫使戰勝的民族接受其文化。（按：在我們中國歷史上，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就是：戰敗的漢族結果迫使戰勝的契丹、女真、蒙古與滿洲諸族接受漢族的文化。）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是不是也發生了這同樣的事情呢？這四千七百個共產黨員（這已近於一師的人數，並且他們全體又是最優秀的），是不是也服從了他人的文化呢？是的，在這裏人們可能得到這樣的印象，以為在這種場合之下，戰敗者有着高度的文化。但實際的情形，決不是如此的。他們的文化是很可憐的渺小的，但是它比較我們的文化還是要高些。不論它如何的可憐與貧弱，然而它比我們負責的共產黨員的文化水準總要高些，因為這些共產黨員缺少管理事業的技能。共產黨員在領導某一機關時——有時，怠工者們故意巧妙地迎合他們，以便利用他們作為掩護物——常常被人欺騙和愚弄。承認這個事實，自然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至少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情；然而我認為這一點是必須加以承認的，因為在現時，這正是問題的焦點所在。……

「蘇聯與俄國共產黨的負責的共產黨員，他們是否會理解到他們是不會管理呢？他們是否覺察到，他們自以為是領導人家，而事實上他們是在被人家領導呢？如果他們覺悟到這一點，那末他們自然就能够學習，因為這是能够學習到的。爲了這，是應當學習的；但是我們的同志却並不學習。我們的同志到處發命令出佈告，然而結果却與他們所期望的相去甚遠。」（同上）

在革命勝利的初期，我們是沒有法子不承認我們的文化是比較別人要低些，在我們中國，這事實

是同樣顯明的。雖然在我們這裏，地主階級也罷，資產階級也罷，它們的文化程度，是更加可憐，更加渺小，但是還是像列寧所說的一樣：「它比我們的文化還是要高些，不論它如何的可憐與貧弱，然而它比我們負責的共產黨工作人員的文化水準總要高些，因為我們缺少管理事業的技能。」這樣，我們是不可能依靠發命令出佈告來解決問題的，我們必需而且也只能依靠學習來解決問題。在這裏，驕傲就會是愚蠢以至滅亡。

一九二一年四月間，列寧「論糧食稅」即已指出：

「不要害怕共產黨員去向資產階級專門家「學習」，其中也向商人，也向小的合作社資本家，也向資本家「學習」。向他們學習應按另一種形式，但實質上是與我們會向軍事專家學習並學會了的一樣。「學習」的結果，只有靠實際經驗來檢查：要做得比旁邊資產階級專門家所做的好一些，要能夠用各種辦法振興農業、振興工業，使農業與工業間的周轉發達起來。爲了「領教」要不惜破費：多花點錢去學習，決不可惜，只要能受到教益。」

寫這些話過了約近一年，列寧又說：

「如果共產黨人能夠用他人的手來建設經濟，而自己則向這資產階級學習，並使資產階級走上利於我們所要走的道路時，那我們便能管理這種經濟了。但是，如果一個共產黨員自以爲我既是負責的共產黨員，我什麼都懂，我所戰勝的人要比店員高明得多，我們在面前撕殺過，並且還不是同這樣的人撕殺哩——正是這種佔優勢的情緒在戕害我們。」（同上引在聯共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因此，列寧指出了要善於與非黨人員合作。

「……務須辦到這一步，即：使那些與我們合作並在數量上遠超過我們好多倍的大批分子，能夠這樣來進行工作，以便我們能善於監督和管理他們的工作，我們能理解這種工作，能用他們的手作出對共產主義有益的事情來。目前形勢的中心關鍵就在這裏，因為雖然有個別的共產黨員已經理解了和看到了這一點。但是，我黨的廣大羣衆對吸引非黨人員參加工作一點之必要，還沒有認識。……」

完全可以明白：列寧當時的這些意見是適用於現在的我們的。

我們要善於學習，要學習使自己會建設經濟；要學習在公營企業中，在合作社企業中，一方面，善於與非黨的專門家合作，善於向他們學習技能，另一方面，則又須善於和暗害的特務分子、破壞分子及怠工者作鬥爭；要學習在建設整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的事業中，一方面，善於與那些擁護新民主主義政權、經營正當營業而能夠並有能力組織生產的「文明的資本家」實行經濟的聯盟與經濟的共處，另一方面，則又須善於與那些經營投機事業而破壞國民經濟建設的「不文明的資本家」作鬥爭。而在這一學習過程中，我們是必須盡量發揮各地方各部門的創造積極性的。正如列寧「論糧食稅」的結論上所說過的：「在振興農業與工業的周轉中，無論如何要在各方面極力發展地方的主動性，首創性和獨立精神。研究這方面的實際經驗。這種經驗儘可能要是各式各樣的。」

59

如果有人擺起官僚架子，表現官僚習氣，既不善於學習這樣，也不善於學習那樣，而辦起事來一場糊塗，那就該怎樣辦呢？列寧主張把他交給法庭，加以審判和禁閉。列寧指出：絕大多數的共產黨

員是好的，可是不善於處理實際工作，因循苟安，亂無章，胡衝亂撞。列寧說：

「在我們的鬥爭中，我們必須記牢：共產黨員是需要深思熟慮的。他們可以很瀟灑地告訴你關於革命鬥爭，關於全世界鬥爭狀況的事情。但是，爲了打破絕望的貧困與窮乏，則須要成爲一個深思熟慮、有教養、有條有理的人；可是他們不會這些。如果我們對負責的共產黨員加以指責，說他們作事不誠實，那是不對的。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九，可說不僅是誠實之人，而且證明了他們在沙皇制度顛覆以前以及革命之後的最困難的條件下面，都是忠於革命的人，可以說他們都是供獻了他們生命的人。因此，要想在這方面找出事業的原委來，那在根本上是錯誤的。我們所需要的，乃是對於最單純的國家事務之文化的處置。我們必須理解，這種事務是國家的事務，是商業上的事務；如果有何種障礙的話，就應當善於克服這些障礙，將那些犯有官僚習氣的人交給法庭。我想無產階級的法庭是善於懲辦的，然而爲了懲辦起訴，那就應當找到犯罪的人。我可以向你們担保，在這一次的事件（按：列寧指當時一個向外國購買食品的事件）當中，是不會找到犯罪的人的，請你們都仔細考察一下，就可知道犯罪的人是沒有的，而所有的，只是各式各種無謂紛擾、奔忙與無意識的事情而已。……沒有一個人是善於處理事情的；沒有一個人懂得對於國家的事務是應當這樣來處理，而不應當那樣來處理。一切白黨及怠工者，都恰恰利用了這一個弱點。」

列寧所責備的那裡從事各式各種無謂紛擾、奔忙與無意識的事情的人，也就是我們這裏平常所指的臆行的經驗主義者與煩瑣的事務主義者。在我們解放區，同樣地是如列寧所指出的：「問題的要點

不在於握有政治權力，而在於善於管理經營，善於適當地佈置人員，善於避免小的磨擦，以便國家經濟不要中斷。」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經驗主義者與事務主義者變成「一個深思熟慮、有教養、有條有理的人」呢：除了善於學習又學習，以便提高自己管理專業的技能，提高自己的文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使得我們善於處理事情，善於管理經營，善於適當地佈置人員，並使我們經營和管理的事業能夠迅速地趕過別人與競爭過別人呢？

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四月間對於蘇聯共產黨工作所作的結論，現在同樣地變成我們今天在中國解放區從事建設工作的結論。列寧說：「現在，全部關鍵在於，先鋒隊不要害怕教育自己，改造自己，公開承認自己沒有充分進備和沒有充分本領等等。全部關鍵就在於現在要協同更無限廣泛和無限強大的羣衆前進，務必協同農民一起前進，用事實、實踐和經驗證明給農民看，我們是在學習，並要學習來幫助他們，領導他們前進。在俄國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在俄國目前的生產力狀況下，只有極緩慢地，極小心地，腳踏實地，千百次實際檢查自己的每一步驟，才能解決這個任務。」（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閉幕時的演說）。

這結論也就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陝甘寧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大會上所作的演講的最後兩句話：

「中國靠我們來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學習。」（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東北日報特載）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劉少奇

目 錄

- 一，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
- 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
- 三，世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現狀
- 四，目前世界的兩大陣營與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
- 五，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進步性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
- 六，結論：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互相結合

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斥責了無產階級叛徒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指出鐵托集團的這種反蘇立場，乃是從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

綱領出發，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的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在這個決議上說：「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蜕化爲一般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我們中共中央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也指出：鐵托集團由於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系列的觀點，因而陷入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同時，又說明了情報局作出上述決議，乃是「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那末，什麼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民族問題的關係是怎樣的？爲什麼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會使南斯拉夫受美國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而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本文打算說明這些問題。同時，爲着使問題清楚起見，本文不得不涉及目前世界的一些根本的狀況。

一、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

民族問題是與階級問題相聯繫的。民族的鬥爭是與階級的鬥爭相聯繫的。正如斯大林所說：「在各個不同的時期，各個不同的階級出現在鬥爭舞台上，而每個階級都按照它自己來了了解「民族問題」。因此，「民族問題」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服務於各種不同的利益，具有各種不同的色彩，而這是以那一個階級和在什麼時候提出這個問題爲依據。」

因此，我們要了解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必須首先了解資產階級這一階級。

64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即英文 NATIONALISM，或譯為國家主義）的民族觀，即資產階級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是根據它的階級基礎、從資產階級一階級的狹隘利益出發的。

大家知道：資產階級這一階級的利益，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上，追求利潤又利潤，有高的利潤，還要更高的利潤。資產階級又分裂有幾種不同的階層，即使在同一階層之中，也還分裂有幾種不同的集團。而為着追求自己的利潤，除開不顧一切地剝削無產階級而外，即使在資產階級同一階級之中，他們也是不惜在尖銳的競爭中，互相吞併，大魚吃小魚，大資產階級吞併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以及這一集團排擠或吞併另一集團。資產階級要佔有國內生產資料與國內市場，但因為它的利潤貪慾並沒有滿足的界限，它還要向國外擴大，在國外佔有市場、原料出產地與投資場所，使其他民族為本國資產階級服務、從而剝削其他民族，同時擠掉他國的資產階級或它的競爭者。剝削僱傭勞動，又在資產階級內部互相競爭、排擠、壓迫、吞併、戰爭，以致世界大戰——經過一切方法以求達到國內的獨佔與世界的獨佔，這就是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天性。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階級基礎，也是資產階級一切思想形態的階級基礎。

從這樣的階級基礎出發，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就是：在自己國內，要使整個人民的利益服從於它這一階級的利益，把它這一階級或其中某一上層階級的利益、放在全國人民的利益之上，並企圖由他們壟斷「民族」這個名義，宣佈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或本民族利益的

保護人，以作爲欺騙人民的工具；同時，在國外，則把自己民族（實質上是指它的上層階級）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對立起來，企圖把自己民族放在其他民族之上，在可能的時候，就去壓迫和剝削其他民族，以其他民族的利益爲犧牲，並從國外的掠奪中分出一部分以收買國內一部分人，去和緩與分裂本國人民對於它的反對。這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發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就是現在以美國帝國主義爲首的世界帝國主義陣營所正在進行的奴役全世界的計劃。

當着一個民族被其他民族壓迫，或在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資產階級爲了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和這類壓迫發生矛盾的時候，它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之下，和人民一起，將這類壓迫進行一定程度的鬥爭的。例如：美國獨立戰爭與南北戰爭時代的資產階級，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意大利統一運動時代的資產階級，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參加民族革命的資產階級。但是，當着資產階級在得勢以後，能够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它就馬上變成這種情形的反面，去壓迫其他民族，成爲其他民族的壓迫者。正如英、美、法、德、意、日等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一樣，在它們得勢以後，就轉而犧牲其他民族的利益，壓迫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變成更小更小的數目，這類極小數目的大銀行家、財政大王、財政貴族一方面，把本國轉化爲財政帝國，對本國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另一方面，把全世界許多民族分別加以征服，瓜分爲幾個財政帝國的殖民地或附屬國，用更殘酷的手段去剝削和壓迫它們。資產階級掠奪的財富

多，他們的貪慾和吞併爭奪的野心，就愈加無底止地擴大，就愈加要加緊對本國人民的壓迫和對全世界各民族實行侵略，並且愈加要在民族主義這個口號之下來實行這種對內的壓迫與對外的侵略，甚至於完全武斷地把自己民族說成是「優良人種」，因而就有權統治世界的其他部分，有權壓迫其他「劣等民族」。由一個帝國主義列強都要爭着掠奪世界的弱小民族，就發生帝國主義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世界大戰。這一切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罪惡，都是資產階級在「民族主義」這一個口號之下幹出來的。

各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如上所述，當它在得勢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去侵略其他民族，但在另外的一定條件之下，即在本國民族受到外國帝國主義強大進攻的時候，或在資產階級一階級或其中某一上層階級的利益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發生尖銳矛盾的時候，或本國人民起來威脅它的統治的時候，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對它施以威脅利誘，它就可以出賣自己的民族，而幫助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來壓迫本國的人民，以本國的人民為犧牲，來達到它保護其財產、維持其政治地位或統治的目的。稍遠的例子，如大家所熟知的，巴黎公社時代法國資產階級的梯也耳（出賣法國給德國）；較近的例子，如半殖民地中國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希特勒面前的法國達拉第和貝當，波蘭的比爾蘇斯基和貝克，捷克的哈柴，挪威的吉斯林等等。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資產主義的危急情況，英國、法國、意大利以及歐洲其他各國的反動派，就更不惜跪倒在美國帝國主義面前，而供其驅使。資產階級只有在對它有利的時候，它才拿出「民族主義」這個口號去煽動人民，而在對這不利的時候，它就毫無民族的氣節，成為民族的叛徒。

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即民族觀，也就代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

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是在根本上相反的。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是從本國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出發，同時也是從全世界各民族的人民羣衆——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民族的侵略，既然是階級剝削制度的一種產物，無產階級不剝削任何人，而且爲追求一個人不剝削人的社會制度而鬥爭，它就必須反對一個民族去壓迫另一個民族。無產階級不能在人類社會上保存任何人壓迫人的制度，否則，就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因此，無產階級堅決反對任何的民族壓迫。它既反對任何異民族壓迫自己的民族，同時，又堅決反對自己的民族去壓迫任何其他民族，而主張一切民族（不論大小強弱）在國際間國內的完全平等與自由聯合及自由分立，並經過這種自由分立（目的是要打破目前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世界大多數民族的壓迫和束縛）與自由聯合（即在打破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由民族實行在完全自願的基礎上的聯合）的不同具體道路，逐步地走到世界的大同。

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處理世界民

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成爲最堅定的領導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戰士。例如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徹底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同時又是最堅決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民族、保衛祖國獨立自由、反對一切帝國賊的革命的愛國主義者與革命的民族戰士。在我們中國，第一個提出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民族獨立的明確綱領的，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中國共產黨，歷來是中國人民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綫的領導者與組織者，而這種民族統一戰綫的規模，包括了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而且一直包括了開明士紳。這種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相矛盾，而且完全一致，成爲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的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爲它的最廣大的直接的同盟軍。這種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就是向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業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就給予世界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以極大的援助和推動。

因此，很明顯，在被壓迫民族中，共產黨人如果不去具體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爲民族解放而鬥爭，而只把「國際主義」當成裝飾的空談，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幫助了帝國主義，結果，就會墮落到像卑鄙下賤的托洛茨基派一樣，成爲帝國主義的忠實的走狗。共產黨人如果在自己民族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又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又去實行民族利己主義，又去爲了一個民族上層階級的利益，而犧牲全世界各民族勞動人民與無產階級羣衆共同的國際利

益，甚至不但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倚靠帝國主義的幫助去侵略與壓迫其他民族，或者以民族保守相排斥的思想去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去拒絕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去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援助了國際帝國主義者，並使自己變成帝國主義陣營內的一個小卒。南斯拉夫的鐵托集團，則正是走着這樣的道路。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壓迫民族中、即在一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是最堅定地、無條件地反對本國民族中的統治者——帝國主義集團去侵略和壓迫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民族，並用一切方法無條件地去援助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主張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脫離本國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完全獨立與完全解放。例如，舊俄帝國、英、美、法、德、意、日、荷、比等國的共產黨人，他們是堅定的國際主義者，所以他們堅決地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者去壓迫與侵略印度、馬來亞、菲律賓、印尼、越南、中國、中南美洲、非洲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堅決主張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因為共產黨人深深了解馬克思的名言：「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夠自由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民族解放運動去消磨、削弱和破壞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就很難在反對獨佔資本的鬥爭中得到勝利，就很難解放自己，所以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同時就是援助了各國無產階級自己的解放。

89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共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政權以後，就必須馬上取消本國帝國主義對於國內及國外一切民族的壓迫。例如：列寧、斯大林在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俄皇及資

產階級臨時政府、取得政權之後，即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地馬上宣佈取消帝俄時代對於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帝俄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奴役制度，宣佈國內民族一律完全平等，這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的實施。

因此，在壓迫民族的國家中，在無產階級的隊伍內，如果有人把「國際主義」作為裝飾的空談，或者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不去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去援助本國帝國主義者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家，這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成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例如：被帝國主義所收買的工人階級上層貴族的代表——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右派和英國工黨的右派，就是屬於這類無產階級的叛徒。又如果共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政權之後，而不馬上取消帝國主義對於國外一切民族的壓迫，並宣佈國內一切民族完全平等，而去繼續這種民族壓迫，而去對其他民族實行侵略，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把「國際主義」當作了裝飾的空談，墮落到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

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壓迫民族也可能變成被壓迫民族。例如，在希特勒侵吞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這樣的時候，這些國家內的共產黨人和那些資產階級的民族叛賣者相反，他們根據上述原則，英勇地站在民族鬥爭的最前綫，為反對法西斯侵略者而戰。又例如，在美國帝國主義馬歇爾計劃下役下的歐洲各國，而同時其中一些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又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之下，繼續

鎮壓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像法國在安南，英國在馬來亞及其他殖民地，荷蘭在印尼所作的，在這樣時候，這些國內的共產黨人，根據上述原則，就一方面，必須堅決抵抗帝國主義者對於自己民族的奴役與侵略，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對於美國的投降和對於自己民族的叛賣，保衛自己民族的獨立；而在另一方面，又必須堅決反對自己民族中的資產階級的統治者對於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政策，反對它們去壓迫和掠奪殖民地民族，無條件地擁護殖民地民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而在這種情況下的歐洲各國社會黨的右派與英國工黨的右派，則是：一方面，他們繼續對殖民地施行帝國主義的政策，另一方面，則擁護奴役自己民族的馬斯爾計劃。共產黨對於這些叛徒們，則是毫不留情地加以反對的。

這些，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各種不同民族與不同情況中，關於民族問題所採取的不同的具體綱領與具體政策。這些綱領和政策，都是根據本民族人民羣衆，又根據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羣衆——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來決定的，同時，也完全符合於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世界觀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應用。

我們知道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又知道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我們就可以懂得：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乃是代表兩個不同階級、互相敵視的兩種世界觀、思想和口號。列寧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可調和——互相敵對的口號，它們是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之兩大階級陣營相適應，而表現了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政策尤其

是兩種世界觀。」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爲什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及其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與理論，必須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嚴格區別出來，任何共產黨人，如果墮落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立場，就是背叛了共產主義。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任何帝國主義，在可能的時候，就一定要去侵略和壓迫其他民族，就一定不會有任何忠心去幫助其他民族爭求獨立和解放，有時，這個帝國主義國家也去援助被壓迫民族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但它也不是爲了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利用被壓迫民族去反對自己的競爭者，避免自己的災難企圖在擠掉它的競爭者以後，去建立它自己對於被壓迫民族的統治。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希特勒要建立所謂「歐洲新秩序」，日本軍閥要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及「中日共存共榮」，美國帝國主義的所謂「馬歇爾援歐復興計劃」與「援助中國經濟建設」及「援助朝鮮獨立」、「幫助菲律賓獨立」，英國幫助印度、緬甸「獨立」等等，其目的，都不是爲了援助其他民族復興，不是爲了援助被壓迫民族爭求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要建立或者要保持它自己對於這些民族的侵略和統治。任何被壓迫民族，都不能從這些帝國主義的所謂「援助」下得到真正的解放與獨立，真正的民族獨立與解放，是不能希望任何帝國主義的好意賜予或忠心援助的。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幻想美國帝國主義會有任何好意給予中國民族真正的獨立、和平、民主以援助，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共產黨人一定要成爲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中最堅定、最可靠和最能幹的領袖，一定要成爲自己民族的正當利益的最堅定的保護者，一定要無條件地去援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一定不能去侵略任何其他民族及壓迫國內的少數民族。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所謂「共產黨人既是國際主義者，就不能成爲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領袖，就不能成爲自己民族、自己祖國利益的保護者」等等說法，以及所謂「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者」，「蘇聯侵略中國、朝鮮及其他民族」，「蘇聯實行擴張政策」等等說法，都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毫無根據的武斷宣傳和惡意誣蔑。只有共產黨人和世界無產階級，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才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爭求解放及保護民族獨立的最可靠的朋友，一切民族，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爭求解放和保衛民族獨立，取得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援助，乃是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這樣，我們就可以懂得：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抱一種不信任、不友好的態度，甚至認爲「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危險，比蘇聯對南斯拉夫的危險還要少一些」，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把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的對外政策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混爲一談或同等看待，用對待帝國主義國家的同樣態度去對待共產黨領導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乃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背叛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墮落到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的結果。

三、世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現狀

帝國主義的侵略，把全世界各民族分爲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兩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列寧關於這兩類民族的狀況，有下列的分析：

「帝國主義大戰後所形成的世界圖畫，其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乃是被壓迫的殖民地——是活生生的被瓜分的國度，如波斯、土耳其、中國，是被戰敗而被投於殖民地地位的國度。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這是這樣的一些國度，這些國度雖保存了它們原有的地位，但它們已陷入對美國的經濟的依賴地位，並在戰爭期間是處於軍事的依賴地位，因爲戰爭包括了全世界，戰爭不許任何一個國家保持真正的神立。最後，還有不到一萬萬五千萬人口，是在這些國度裏，在這三國度裏，不消說只有上層分子，只有資本家，才享受了瓜分世界的利益。共計十七萬萬五千萬人。這就是地理上的全部人口。」（在一九二三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關於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

這就是近代世界上的民族問題。這就是少數國家的帝國主義者「上層分子、資本家」兇惡地壓迫與掠奪全世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問題。這種民族問題的情況，又是反映了世界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反映了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尖銳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不能不引起各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殖民地的尖銳鬥爭；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發生一切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爭求解放的世界範圍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期，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俄國的無產階級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障壁，成就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遂分裂為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就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在這種總危機下面，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變得更加偏激、殘暴，更富侵略性。以奴役世界各民族為目標的德、意、日等國的法西斯主義，便是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矛盾中的最朽腐、最反動的獨佔資本的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的法西斯被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各國反法西斯力量所打敗；東歐各國人民在蘇聯援助之下，繼起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障壁，建立了新民主國家；世界各國共產黨，由於在反法西斯大戰中成為保衛自己祖國最英勇的領導者與最堅強的力量，因而在人民中有極高的威信，各國共產黨都空前地強大了；東方的民族革命鬥爭，在中國、越南、印尼、緬甸、馬來亞等等，正如燎原之火。這樣，世界的情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已起了新的根本變化，表現了資本主義總危機比第一次大戰後有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在這個時候，美國帝國主義就代替希特勒和日本軍閥，製定了統治世界各民族的更兇惡的奴役計劃及其對全球的擴張政策。不消說，這又是一個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過程中，最朽腐最反動的獨佔資本的產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民族圖畫的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

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蘇聯，這是世界各民族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領導者，在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主義之後，正在繼續向無限的繁榮前途前進，並繼續為保衛世界的和平、民主與各民族的

獨立而奮鬥。這個國家擁有二萬萬人口。其次，蒙古人民共和國人口一百萬。這是老早解放了的。再其次，是東南歐的各新民主國家，捷克斯拉夫、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共有八千五百萬人口，從德、意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來以後，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走向社會主義。其中，只有南斯拉夫，由於鐵托集團的背叛，無產階級正在進行反對其背叛者的鬥爭。又其次，解放了的北朝鮮和德國東部，人口約近三千萬。此外，今天還在繼續直接和外國帝國主義及本國賣國賊戰鬥着的民族，如我們中國的解放區，擁有一萬萬六千八百萬人口；業已完全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正在進行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如果再加越南、印尼、希臘等國業已解放了的人口，這樣，直到今天為止，全世界約二十萬萬人口當中，約有五萬萬以上的人口業已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了。人民在這些國家中，真正獲得了獨立自由的主人翁的地位。

這些業已解放了的人口，已超過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這是表現着世界的新生，表現着世界人類在爭求解放的鬥爭中所業已達到的範圍和水準。無疑的，這些解放人口的數目，在今後將要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世界全部人類都將在不久的將來要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不管鬥爭可能還有各種曲折，這個解放的總方向，乃是歷史必然的不可抵抗的規律。這在我們中國，由於偉大的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全中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完全解放的前途，乃是特別明顯的可以看到。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在德、意、日法西斯被打敗之後，世界上六個大帝國主義國家（美、英、法、德、

意、日）已有三個被打倒。現在世界上擁有多少大小不一的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還有美、英、法、荷、比、葡等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減少了，但是，由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各民族的規模，却是空前的。荷、比、葡之類的國家不消說了，即使像英、法這樣的國家，也因在大戰中受了極大的損傷而變為軟弱無力了。雖然這些國家的反動派還在繼續用殘暴的帝國主義的流血方法去屠殺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但由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出賣自己民族，與社會黨及工黨的右派的叛賣本國人民的政策，已把自己國家貶為美國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附屬國與保護國了。所以除了上述業已解放的五萬萬以上的人口之外，全世界各民族（不包括美國在內）有十三萬萬幾千萬的人口，或是直接地、或是間接地處在一個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而英、法、荷等國的反動派，則實際上變成了美帝國主義的幫兇和賣國賊。美國只擁有一萬萬四千萬人口，而站在美國人民頭上的，也只是摩根、洛克菲勒、杜邦、梅隆等著名的八大財團，其反動運動的代表人物，只不過是一小撮，約一千個人而已。

八大財團，一千個人，一方面，在國內，統治了一萬萬四千萬的美國人民；另一方面，又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在國外，直接與間接地奴役世界上除蘇聯及其他業已解放的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如果把美國人民這個數目也包括在內，那末，這就是說，美國八大財團直接或間接地統治佔地球將近四分之三、即十四萬萬幾千萬的人口，而且它們還在千方百計地妄想：有一天在蘇聯及其他解放了的地方建立起美國帝國主義的奴役制度。

這就是目前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狀況。

四、目前世界的兩大陣營與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

如上所述，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主要的就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壓迫和掠奪、或者企圖要去壓迫和掠奪全世界各民族的問題，就是全世界各民族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掠奪，以爭取民族解放、或保衛民族獨立的問題。

美國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製訂了他們掠奪和壓迫全世界各民族的計劃。大戰結束後，他們實行了社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就一步接着一步地把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置於自己的控制和統治之下，在全世界佈置軍事基地網及插足一切國家和干涉一切國家的內政，這些都是他們的野心侵略計劃的產物。而他們這種侵略計劃，正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一樣，是在所謂「防蘇防共」的口號之下進行的。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用盡一切力量動員本國的人民來支持它的計劃，就不能不嚴厲壓迫本國人民中反對它的計劃的一切力量。因此，它就要向美國人民宣傳所謂「美國世紀」，及白色人種優越的「理論」，說美國應該「領導世界」，全世界各民族都應歸它統治。因此，它就要壓迫美國共產黨、美國進步的工會及華萊士領導的進步運動，並在美國建立法西斯式的統治，否則，它就不能實現自己的計劃。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拚命反對世界上一切反抗它實行這種計劃的力量。它就要反對蘇聯，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反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解放運動，反對希臘、越南、印尼、馬來亞、緬甸、菲律賓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對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因此這一切國家和這一切力量，結成了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堅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因此，它就在鐵托集團表示了反蘇立場、脫離了共產黨情報局、並在國內實行摧殘真正一步的有生力量之後，表示了情不自禁的歡呼；它就要準備着在將來什麼時候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妄想去征服世界上一切反抗它的力量。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在世界各國尋找能够執行與贊助它實行這種計劃的走狗和代理人，尋找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並且援助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去鎮壓各國人民的反抗運動與反對蘇聯。它就要援助世界各國的反動派，援助德國、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殘餘勢力，使其復活，因爲這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反動黨派和法西斯殘餘勢力作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and 走狗，在美國援助之下，去鎮壓本國的人民和殖民地民族的反抗運動，去反對蘇聯和各國人民民主力量。

然而，也由於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民族，民族問題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成爲更大多數人口的問題，反帝國主義的陣營在民族問題上是更加擴大了，而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則已更少，也更加孤立了。帝國主義的基礎已經更加動搖，它們的整個力量已經並正

在大大地削弱，被它們所壓迫的人民，已經並正在日益廣大地加入反對它們的鬭爭，最後推翻它們的統治的日子，已經更加接近了。歐洲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同時就是這些國家的賣國賊，即全民族的敵人；而歐洲各國無產階級要獲得社會主義，就必須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奴役，又反對本國的賣國賊。階級問題和民族問題是這樣明顯地聯結起來，這就有利於歐洲各國無產階級，一方面，團結國內更廣大的人民，而把保衛自己民族獨立與爭取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另一方面，又團結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更廣大的人民，而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自己爭取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自己民族，既是反映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反映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極端尖銳化，反映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正坐在新的猛烈危機的火山口，而企圖作瘋狂的垂死的掙扎；同時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計劃，又正是加強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發展，加強了資本主義世界各種基本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與市場的矛盾，帝國主義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的尖銳化，而促進全世界大多數的人口不得不爲自己的解放而實行全世界的大聯合，並以此促進帝國主義的死亡。

現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加緊進行奴役世界各民族的活動，英、法、荷等國帝國主義者在美國援助下對於殖民地民族的加緊鎮壓，以及各國人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的人民民主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已使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空前地緊張起來。現在世界上已分爲這樣兩個互相敵對的陣營。一方面，是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世界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這就是世界的帝國

主義陣營。另一方面，是蘇聯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中國和東南亞各島與希臘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這就是世界的反帝國主義陣營。美國帝國主義成爲世界一切反動力量的堡壘，而蘇聯則是一切進步力量的堡壘。這兩個陣營，包括了全世界的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和一切階級、階層與黨派。在這兩個陣營處在這樣相互緊張鬭爭的時候，人們不站在這一邊，就要站在那一邊，即是說，你不站在帝國主義陣營幫助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去奴役世界或奴役自己民族，你就要站在反帝國主義陣營去幫助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或爲自己民族的解放而鬭爭，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而同時，這也就幫助了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幫助了美國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幫助了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不站在這一邊，又不站在那一邊，而實行中立，則是不可能的。在目前世界這種緊張形勢下，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所早已指出的：所謂「中立」，只是一種騙人的鬼話，不管你主觀上是否有意去騙人。

由此可見，在目前世界這種形勢下，一切被壓迫民族要求得解放，就不能不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走狗——本國的賣國賊，就不能不反對世界各國的反動派，就不能不聯合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就不能不聯合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人民民主力量，就不能不聯合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就是說，不能不站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向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和在世界上的走狗進行堅決的鬭爭。否則，任何民族的真正解放，都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美、英、法、荷等國，特別是美國的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和這些國家的人民民主力量，

如果能够起來推翻這些國家的獨佔資本家的統治，廢棄其帝國主義的內外政策，實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國內政策與民族政策，那末，它將造成的結果，就不只是要澈底解放這些國家的人民，而且要澈底解放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所以，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在國內的澈底勝利，以及他們對於獨佔資產階級統治的每一個打擊，都是對於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因此，世界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就必須十分注意地去取得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援助，和他們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為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援助了另一方面的勝利。

由此可見，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反抗美、英、法、荷等國帝國主義的勝利，使這些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失去殖民地，即失去它們統治世界的基礎，因而就要大大削弱這些帝國主義者對於國內的統治力量，因而就使這些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能夠比較容易地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勝利，以及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每一個打擊，都是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世界各國的、特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就必須更加努力地支援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更加進一步地去和他們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為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又同樣地：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援助了另一方面的勝利。

由此可見，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蘇聯的存在及其強盛，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存在及其發展，

都是對於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對於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極大的打擊，都是表示與加強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都是促進資本主義世界走向最後崩潰，都是加強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及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陣營，都是促進世界各國社會主義的及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走向勝利。一九二五年春天，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孫中山臨終時致蘇聯遺書說過：『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的國防制度中謀解放。』這個真理是常新的。這個真理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戰中更進一步地被證明出來了，而在現在與今後世界人類的解放鬥爭中，又將更進一步地加以證明。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所闡釋的，或者聯合蘇聯，或者聯合帝國主義，二者必居其一。這是愛國與賣國的界限，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這是世界上不論那個民族是走向進步或是走向倒退的界限，而反對蘇聯，必然只符合帝國主義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所有上述種種，都說明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與人民民主力量，都必須互相聯合起來，都必須和蘇聯聯合起來，都必須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才能戰勝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及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統治，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即解放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並從而解除作爲帝國主義侵略根源的獨佔資本在其本國的統治。

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按照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按照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

族觀及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聯合世界各國一切勞動人民及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聯合蘇聯與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共同奮鬥，互相幫助，互相支援，才能解放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

這就是說：如果實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不去聯合蘇聯，而去反對蘇聯，不去聯合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而去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不去聯合世界各國的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民主力量，而去反對各國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民主力量，不去聯合一切被壓迫民族，而去反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如鐵托集團在南斯拉夫所作的那樣，那就必然要去聯合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就必然要站在帝國主義陣營，聯合世界各國的反動勢力，就必然不能成功任何民族解放事業，更不能成功任何社會主義事業，就必然要使自己民族受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所愚弄和侵略，以至喪失自己民族的獨立，使自己國家變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因此，正如中共中央所說，共產黨情報局在自己的決議中向全世界及南斯拉夫人民指出這種危險前途，以便南斯拉夫人民覺醒起來糾正鐵托集團的錯誤，乃是「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

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根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不是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必須廢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不是根據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去指導目前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使這種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密

切地結合起來，才能使這兩種革命都得到勝利，才能解放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問題。否則，不獨不能取得任何社會主義的勝利，也不能取得任何民族解放運動的真正勝利。

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應該和世界上整個革命問題聯繫起來看，應該從歷史全局與世界全局來看，而不應該孤立地從局部的觀點上去看，不應該從任何超現實的抽象的觀點上去看。正如列寧和斯大林所說：民族問題不應該孤立地去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依據新的世界歷史全局，民族問題應該從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範圍內去估量，而不應該再從這個新時代以前的舊的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去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以前，民族問題乃是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在這以後，民族問題乃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所詳盡地發揮了的斯大林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以及在這本書中所詳盡的分析了的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轉到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乃是完全正確的。只有根據這個正確理論去指導民族解放運動，才能解放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在中國從事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一切人們，首先是共產黨人，但是不獨共產黨人，任何一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只要他們是真心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而不是表面上講革命、實際上想做

壞革命的人們，他們就應當這樣去想、去做，而不應當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如果他們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那麼，他們就將誤入歧途，而為革命隊伍所拋棄。

毫無疑義：把民族問題從階級問題分開來看，把民族的鬥爭從階級的鬥爭分開來看，乃是完全錯誤的，有害的，乃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一種欺騙。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近代帝國主義侵略，既然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發展所形成的一種政策，而目前美國帝國主義企圖實現世界霸權的夢想，乃是其最後的產物，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世界的反革命政策，就更加空前明確地把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繫起來，也更加空前明確地指出了：要消滅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源，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獨佔資本的統治。

人類解放鬥爭的總前途，乃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恰如莫洛托夫的名言：『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條條道路都通到共產主義的時代。』各民族的人民，都將經過自己具體鬥爭的道路，到達這一點，而在被壓迫民族中，民族解放的鬥爭，則是一種必須經過的道路。只有社會主義廢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像在蘇聯那裏一樣，才能完全消滅侵略的可能性。社會主義的蘇聯廢除了一切階級剝削制度，社會生產力在那裏有無限發展的前途，它既不允許別人去侵略它，也絕不允許、更完全不需要去侵略別人，所以它就成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堡壘，成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可靠的和最好的朋友。當社會主義制度逐步在各國實現之後，那個『侵略』的字眼，便只能在世界人類頭腦的歷史回憶中成為古怪的字眼而存在了。

這就是全人類最後解放、也就是全世界各民族最後解放所必須經過的道路。

五、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進步性與

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歷史看任何問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區別了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區別了它的客觀作用的不同，並決定了無產階級對它的不同的態度。

當資本主義初起時代，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民族運動，是爲反對異民族壓迫，建立民族國家。這是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的，無產階級曾經擁護了這樣的民族運動。在近代，則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也是有其客觀歷史上的的一定的進步意義。

歐美和日本的資產階級在許多落後民族中，建立了帝國主義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在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中，例如在中國、印度、朝鮮、印尼、菲律賓、越南、緬甸、埃及等等，又不可避免地生長起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因爲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第一和帝國主義有矛盾，第二和這些國家的落後封建勢力有矛盾，而這種封建勢力又與帝國主義相結合，限制和損害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因此，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歷史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就有其革命性，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其動員羣衆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時候，就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正如

列寧所說：「這種民族主義有着歷史的正當性」（在東方人民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因此，無產階級對於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應當在同盟者「不阻礙我們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和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羣衆」（列寧）的條件之下，與這種有一定反帝反封建作用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合作，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這種合作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孫中山的合作。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一種。但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上的分析：孫中山三民主義，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及十月革命以後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發生了分別爲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的重大變化；在前一個時期，是屬於舊民主主義，即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是舊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在後一個時期，則是屬於新民主主義，即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成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舊民主主義時代的兩重性質，就是：他反對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滿族朝廷，有進步的性質；但是，提倡大漢族主義，就是反動的性質。但在十月革命之後，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時代，由於他接受了蘇聯與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把那種大漢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加以修改，轉到主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的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時候，轉到主張「中國民族自求解放」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時候，這就

轉向到新民主主義，而我們共產黨人也就不採取和他合作的政策。這種合作，對於民族解放和當時無產階級的利益，都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即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的、動搖不定的，在後來又被孫中山的無恥叛徒所破壞。

雖然，即使在這種時候，孫中山的世界觀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他的民族主義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還帶有反動性質的一面（例如：所謂「血統」、「國族」的觀點，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等），可是在這時，他主張「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民族革命主義，實行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這就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中，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進步性的高度表現，這就有很大的革命意義。

但是，隨着孫中山逝世不久，孫中山的無恥叛徒——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就把孫中山的民族革命主義拖到了另一種極端相反的反革命道路，由反帝轉到降帝，由聯蘇轉到反蘇，由聯共轉到反共，由擁護工農轉到屠殺工農，並利用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裏面屬於保守性質和反動性質的東西，變成他們反民族的旗幟。因此，共產黨也就必須轉到採取堅決的政策去反對以蔣汪兩賊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以保衛民族的利益。

當然，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中，像在印度、緬甸、暹羅、菲律賓、印尼、越南、朝鮮南部及其他地方，共產黨人對於那一部分已投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主要是大資產階級反動派），也同樣地必須採取反對他們叛賣民族的堅定政策，以保衛自己民族的利益。否則，就是極大的

錯誤。而對於尙在反對帝國主義，並不反對人民群眾起來進行反帝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共產黨人就應當和他們建立反對帝國主義的合作；而如果不認真地去建立這種合作，或者反對、或者拒絕這種合作，那也就是極大的錯誤。即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的、動搖不定的，都必須認真地去建立。

世界各國革命的經驗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都充分地說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是與階級問題相聯繫、民族的鬥爭是與階級的鬥爭相聯繫的科學分析，是完全正確的。根據階級的歷史分析，我們就可以知道：爲什麼一個民族在某種時候會被另一個民族所壓迫，而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爲什麼這樣的民族不但從封建階級中而且可以從一部分資產階級（例如中國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中出現賣國賊；又在什麼條件下，必須依靠什麼階級的領導，才能獲得民族的解放；等等。根據階級的歷史分析，同樣地可以告訴我們：雖然在我們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中出現過像孫中山這樣傑出的民族革命家，但一般說來，這裏的資產階級也是只按照他自己的階級的狹隘利益去看民族問題，並根據他一階級的利益或這樣變化、或那樣變化的。而同樣地，只有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才是真正地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同時，又是和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即全人類共同的國際利益完全一致。當無產階級在被壓迫民族中出現在鬥爭舞台上，成爲全民族反帝鬥爭的首領、成爲全民族的救星的時候，例如在中國，任何階級、黨派或個人，如果是真正的愛國者，像孫中山一樣，就必然要和共產黨合作（與聯蘇及擁護工農利益相聯繫）；反之，如果他反共（與反蘇及反對工農利益相聯繫），像蔣介石汪精衛一樣，結果就必然成爲帝國主義的奴才，成爲萬惡不赦的漢奸賣國

賊。

同時，這種階級的歷史分析，也告訴了我們：由於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與國內階級鬥爭的存在，當國際與國內的歷史鬥爭尖銳化的新場合或新時期，革命隊伍中也可能出現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與南斯拉夫的鐵托這類人物，他們投降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背叛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並將本民族的人民解放事業，置於極端危險的地位。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代言人。他們不惜把任何民族解放事業半途而廢，使自己的國家變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這是一切國家的共產黨與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加以警惕的。

六、結論：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互相結合

前述一切，就是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黨人關於民族問題的觀點和原則，即是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觀點和原則。

顯然，各國人民大眾的真正的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矛盾，而是互相結合的。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寫過：『對於我們，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密切結合着，我們的口號，是爲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不消說，這些話也完全適合於我們今天的愛國革命戰爭。

列寧把愛國主義形容爲『許多世紀與數千年來分隔的國家所鞏固起來的最深厚的感情之一。』真

正的愛國主義乃是對於數千年來世代相傳的自己祖國、自己人民、自己語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之熱愛，這種愛國主義，是和那種自大自私的、排外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及反映那種落後的家長制的、小農的狹隘閉關主義、孤立思想、宗派主義、地方主義等民族偏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真正的愛國主義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同時希望世界人類優秀的理想在自己國內實現，主張各國人民的親愛團結。至於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則煽惑各國人民的互相敵視與仇恨，而落後的安長的民族偏見，則把自己民族和世界隔絕起來，糾纏於坐井觀天和不長進的過程之中。所有這些，我們都必須堅決地加以反對。

以上，就是我們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大略解釋。現在不論在我們黨內和黨外，對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有甚多的誤解和模糊的觀點。此外，法西斯分子還有關於這個問題的極端反動的欺騙宣傳。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如果不加以清除，這些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如果不加以揭露，對於目前中國的人民解放運動，將是極端有害的。本文的發表，希望能在清除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及揭露法西斯主義宣傳的努力中有所幫助。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東北日報轉載）

